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第86期（民國103年12月），49-93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從自我書寫到公眾展演：艾佩琪（Peggy Abkhazi）的戰時日記*

連玲玲**

摘要

本文以艾佩琪（Peggy Abkhazi, 1902-1994）為例，分析日記的書寫與流通如何影響自我的建構。二十世紀初出生於上海的英籍婦女艾佩琪，在太平洋戰爭期間被拘禁於上海龍華的「敵國人集團生活所」，此乃日軍在占領區內針對交戰國的非戰鬥人員所設置的收容所，以杜絕任何抵抗或通敵行為。珍珠港事變一爆發，艾佩琪便立志為這個時代留下見證，並一直持續到戰爭結束，因此這部日記可謂其戰爭經驗、尤其是拘禁時期的生活紀錄。不同於一般將日記視為擷取資訊的資料庫，本文的研究重點乃在於日記如何成為戰時日常生活的一部份，以及它對日記作者的意義。後來這部日記在1980年代以後，分別在加拿大及英國出版共三次；由於出版過程影響日記的解讀方式，因此本文也探討日記作者如何透過出版來自我展演、進而重新定義自己的角色。日記出版之後，它又成為「上海外國人」主張集體記憶的文本，並成為艾佩琪新移民地的地方認同文本。整體而言，本文希望藉由多層次地閱讀日記，探索更多日記研究的可能性。

關鍵詞：日記、太平洋戰爭、敵國人集團生活所、集中營、上海外國人

---

* 本文係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太平洋戰爭期間日本在華的『敵國人收容所』」（NSC102-2410-H-001-021）的部份成果，初稿曾宣讀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日記中的性別」工作坊（2013年7月30日至8月2日）及美國歷史學會年會（Annual Meeting of 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 January 2-5, 2014），承蒙沈松僑教授、李丹柯教授、張寧教授、與會學者及本刊匿名審查人的指正，謹申謝忱。
收稿日期：2014年2月18日，通過刊登日期：2014年9月5日。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近年來史學界掀起一股「日記熱」，其中 2006 年〈蔣介石日記〉在美國史丹佛大學的公開，成為中國近代史研究的盛事，一時之間，海內外學者爭先前往閱覽抄錄，以〈蔣介石日記〉為主題的學術會議及論文專著相繼出現，冀由新材料為歷史人物進行再評價。[1]事實上不僅政要人物日記受到矚目，海峽兩岸的學術機構也致力於地方菁英及常民日記的徵集與研究，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就藏有如林獻堂、張麗俊、黃旺成、吳新榮等人的日記，並召開解讀班及學術研討會。[2]中國人民大學家書文化研究中心則積極向社會大眾徵集日記，並開闢論壇披露關於日記的軼聞。[3]日記之所以受到關注，不但因為它是「當時人記當時事」的一手材料，更因為它所具備的私密性，被認為具有較高的「真實性」，是「歷史研究的頂級材料」，[4]且是「一種重要的史料形式，或以文獻濟日記之不足，或以日記證檔案之真偽」。[5]此外，由於日記的內容涉及較多作者本身的生活點滴及思想情緒，因此也提供社會史及心態史的寶貴材料。

不過，日記除了具有史料價值，也是一種日常活動。王汎森研究明末清初士人社群時，特別強調日記在個人修身實踐上的作用，[6]張淑雅則從〈蔣介

1 相關學術研討會如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開拓或窄化？：蔣介石日記與近代史研究」（2008）、國史館的「蔣介石日記與民國史研究」（2010）、政大歷史系的「蔣介石人際網絡研究」（2010）、「蔣介石日常生活研究」（2011）等。專書則以楊天石的《找尋真實的蔣介石：蔣介石日記解讀》（香港：三聯書店，2008）最為著名，另外陶涵（Jay Taylor）的 *The Generalissimo: Chiang Kai-shek and the Struggle for Modern Chin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也利用不少蔣介石日記材料。以蔣介石日記為主要史料的單篇論文數量更多，初步以「蔣介石日記」為關鍵詞搜尋，在 2007 年至 2013 年間，至少出版 38 篇學術論文。

2 中研院臺史所收藏的日記內容介紹，參閱「臺灣日記知識庫」：http://taco.ith.sinica.edu.tw/tdk/%E9%A6%96%E9%A0%81。（2014 年 1 月 22 日檢索）

3 該中心以家書為主要蒐羅對象，後擴及私人日記及回憶錄，徵集公告參閱：http://www.jiashu.org/bbs/index.asp?boardid=6。（2014 年 1 月 22 日檢索）

4 許雪姬，〈序二〉，收入許雪姬主編，《日記與臺灣史研究：林獻堂先生逝世 50 週年紀念論文集（上）》（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08），頁 iii。

5 呂芳上，〈提供史料不提供觀點的盛會〉，收入呂芳上主編，《蔣中正日記與民國史研究（上）》（臺北：世界大同出版有限公司，2011），頁 1。

6 王汎森，〈日譜與明末清初思想家——以顏李學派為主的討論〉，《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69 本第 2 分（1998 年 6 月），頁 245-294。

石日記〉注意到「日記書寫」對於政治人物個性塑造的重要性。[7]正如俄國史家巴愛琳（Irina Paperno）所指出，日記既是時空脈絡下的歷史行動，也是再現這個脈絡的文本。她提醒讀者，日記和其他文類一樣，所有的觀察與記載都經過中介（mediated）的過程，因此不應該被視爲作者的日常／私密生活倉庫，而應視之爲作者有意識地創造私密性的場域，並呼籲把日記放回歷史脈絡，從書寫的生產及流通方式來研究、理解日記。[8]

受到巴愛琳的啓發，本文將以艾佩琪（Peggy Abkhazi, 1902-1994）爲例，探討日記的書寫與流通如何影響自我的建構。二十世紀初出生於上海的英籍婦女艾佩琪，在太平洋戰爭（1941-1945）期間被拘禁於「敵國人集團生活所」，此乃日軍在占領區內針對交戰國的非戰鬥人員所設置的收容所，以杜絕任何抵抗或通敵行爲。珍珠港事變一爆發，她便立志爲這個時代留下見證，因此這部日記可謂其戰爭經驗（尤其是收容所生活）的紀錄。其實像她這樣在收容所內勤寫日記的人並非特例，光是倫敦的「帝國戰爭博物館」（Imperial War Museum）收藏至少 10 件被拘禁在中國的英國平民所寫的日記，短則數頁，長則百頁以上。[9]艾佩琪是少數戰後將日記出版、且公開相關檔案文件的作者：她在過世之前，即將她的敵國人臂章、證件、日記原稿以及日記出版事宜的相關書信文件，捐給加拿大的維多利亞大學（University of Victoria），名爲《艾氏檔案》（Abkhazi Archives）。雖然我們無法確知艾佩琪是否爲出版收容所日記的第一人，[10]但本書的出版的確引起一些迴響，特別在有相同關押經驗的社群中。例如同樣在龍華收容所待了二年多的英國人費肯尼（Kenneth Flemons），讀了艾佩琪的日記之後，也開始撰寫回憶錄，並將未刊稿捐給帝

---

7 張淑雅，〈蔣介石一瞥：1950 年代後期日記中的觀察〉，《臺灣史研究》，卷 18 期 1（2011 年 3 月），頁 185-216。

8 Irina Paperno, “What Can Be Done with Diaries?” *The Russian Review*, 63:4 (October 2004), pp. 565-566.

9 http://www.iwm.org.uk/collections/search?query=internment+and+Shanghai%2C+diary&submit=&items_per_page=50。（2013 年 6 月 19 日檢索）

10 在艾佩琪之前，已經有人出版太平洋戰爭期間被日軍拘禁的故事，但多半是回憶錄的形式，以日記的原始面貌出版者較少。

國戰爭博物館。在回憶錄的前言，作者提及艾佩琪的日記對他的影響，以及他與艾佩琪對龍華收容所有不同的感受與印象。[11]換言之，從她的日記，我們不僅可以深究被關押在收容所內「敵國人」的書寫行為，包括書寫的動機、內容、表達方式等，還可以進一步探討，日記從私文書轉變為公開出版品的過程中，日記主所表現的自我意識及能動性，以及日記文本對於形構集體記憶所扮演的角色。因此，本文的研究重點，不在於利用日記資料全面性地再現敵國人收容所的生活樣貌（儘管透過日記的敘事分析，本文仍然部份地揭露了收容所的情景），而將焦點放在日記主及日記的本身，以「微觀歷史」（microhistory）的視角，思考日記研究的多元可能性。

所謂「微觀歷史」，乃透過小人物或瑣碎事物的深描細寫，提供「另類的」（alternative）歷史圖像，通常侷限於地方性的社區或社群，且多以個人生命經驗為故事發展的主軸。其意義不在於展示人類在「大歷史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或造成的衝擊，而是挑戰「大歷史過程」信念的本身，藉由顯微鏡式的精細觀察，說出不一樣的故事。[12]以「書寫自我」為目的的日記是最適合用來研究「微觀歷史」的史料之一，尤其是常民百姓的日記，往往流露「非菁英」或「非主流」的觀點。這不單是為了補充更多歷史行動者的聲音，更得以檢測主流歷史論述的有效性——究竟一般所習以為常的「大歷史過程」如何被非菁英所理解、接受、拒斥或挪用，這在微觀史學的視角下看得較清楚；而這也正是本文的研究目的：不把艾佩琪當成「超然」的歷史事件報導人，而是視為歷史事件的參與者，因此研究她的日記，除了注意事件的描述，文本中表露無

[11] Ken Flemons, "Out of the Frying Pan," Private Papers of K. J. Flemons, Documents 2230, Imperial War Museum.

[12] 關於「微觀史學」的發展過程，參閱 Carlo Ginzburg, "Microhistory: Two or Three Things That I Know about It," *Critical Inquiry*, 20:1 (Autumn 1993), pp. 10-35。其定義、研究目標及方法論，參閱 Brad S. Gregory, "Is Small Beautiful ? Microhistory and the History of Everyday Life," *History and Theory*, 38:1 (February 1999), pp. 100-110；Jill Lepore, "Historians Who Love Too Much: Reflections on Microhistory and Biography,"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88:1 (June 2001), pp. 129-144.；Lara Putnam, "To Study the Fragments/Whole: Microhistory and the Atlantic World," *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 39:3 (Spring 2006), pp. 615-630。

遺的日記主個性、情緒、日常生活等也是考察的對象。

本文主角艾佩琪並非社會知名人物，關於她的研究並不多，除了紐西蘭籍的記者高凱琳（Katherine Gordon）寫過她的傳記外，[13]僅見主修文學的麥蘿瑞（Laurie McNeill）在其博士論文以她的日記爲個案，探討日記文本所呈現的社群與認同。[14]和一般傳記一樣，高凱琳所撰寫艾佩琪的傳奇故事，始於傳主的出生，終於她的離世；不過關於日記所提及被關押的收容所生活一節，傳記作者乃輕描淡寫地帶過，全書 240 頁只以 12 頁的篇幅簡單敘述。至於麥蘿瑞的研究則著重於日記如何成爲展示性的文類（genre），她認爲艾佩琪不但在移民至加拿大維多利亞市之後，藉由與喬治亞流亡王儲的婚姻，自我塑造「王妃」的新形象，就連戰時日記的書寫，也帶有展演的意味。[15]儘管筆者也關注日記這種「私文書」如何成爲「自我展演」的舞台，但艾佩琪一開始寫日記時，並沒有明確要「公開傳世」的企圖，反而在日記中處處看出她在集體化的日常生活裡維護私我界線的努力，即便某些特立獨行的突兀行徑不免令人感覺是矯情的自我表現，但從日記的角度而言，出版之前仍只是一種私人紀錄，作者本身是最主要的讀者；這些敘述更像是肯定自我價值的宣示，而非爲了自我展演。因此，日記中所反映公私領域的界線，乃是隨著時空變換而不斷游移的歷史建構——而這也是本研究的特殊之處，即試圖追究日記出版的過程及其在不同的社會脈絡下蘊藏的文化內涵。本文所採取的研究策略，乃將艾佩琪的戰時日記放回其原來的歷史脈絡，探討其戰時書寫的過程與戰爭書寫的內容。這部日記先後曾於 1981、1995、2002 年出版共三次，初版由於印量不大，發行網亦有限，收藏的圖書館不多，筆者僅能以所見的第二版及第三版加以比較：第二、三版的出版社不同，書名、封面設計

13 Katherine Gordon, *A Curious Life: The Biography of Princess Peggy Abkhazi* (Winlaw, British Columbia: Sono Nis Press, 2002).

14 Laurie Ann McNeill, "Public Designs for a Private Genre: Community and Identity in the Diary," Ph. 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2004.

15 Laurie McNeill, "Performing Genre: Peggy Abkhazi's *A Curious Cage* and Diaries of War," *Canadian Literature*, 179 (Winter 2003), pp. 89-105.

及插圖的選擇也不同，兩家出版社還分別請不同的作家爲這本日記作序跋；不過二個版本的日記正文則完全一樣，亦均收錄傑克曼（S. W. Jackman）所撰寫的導論。由於出版過程影響到如何解讀這部日記，因此除了文本分析，本文也將從出版的角度看戰時日記的戰後發展，並討論個人日記如何在不同的層次上形塑集體記憶。

從富家女到「敵國人」

艾佩琪原名卡瑪喬（Marjorie Carter），[16]1902 年出生於上海，父親卡威廉（William John Blaylock Carter）是位英國建築師，1899 年隻身闖蕩上海，加入德和洋行（Lester, Johnson & Morriss），曾參與外灘匯中飯店（Palace Hotel）的設計。母親步美寶（Mabel Blackburn）出身英國中產階級，在父親的安排下與卡威廉訂婚，不過要到 1901 年才赴上海完婚。婚後，步美寶發現丈夫不但酗酒、嗜賭，而且精神狀態不穩定；她自己也因不適應上海的濕熱氣候，健康日益受損。1906 年，身心俱疲的步美寶決定離開丈夫，帶著女兒瑪喬回英國娘家養病，但病情不見好轉，不久即去世。幼小的瑪喬先在外公家住了半年多，後來由姑姑扶養。1907 年 3 月 16 日，卡威廉病逝上海，在朋友的安排下，由英國富商龐湯姆（Thomas Pemberton）夫婦出面領養卡瑪喬。龐湯姆於 1863 年到上海，擔任會德豐駁船行（Shanghai Tug and Lighter Company, Ltd.）的監督（superintendent）。因膝下無子，便慨允領養卡瑪喬，1907 年回到英國迎接這位新的家庭成員，並將之改名爲龐佩琪（Peggy Pemberton）。

在養父母的悉心栽培下，佩琪接受中產階級的傳統英式教育，她對音樂

16 日記作者因收養、結婚數度更換姓氏，爲避免混淆，行文中以其名佩琪或艾佩琪稱之。本節關於日記主艾佩琪的生平，主要參考 Katherine Gordon, *A Curious Life*、S. W. Jackman, “Editor’s Introduction”，以及 Katherine Gordon, “Afterword: A Curious Life”，均收入 Peggy Abkhazi, *A Curious Cage: Life in a Japanese Internment Camp, 1943-1945*, edi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S. W. Jackman (Victoria, B. C.: Sono Nis Press, 2002)。

特別有興趣與天賦，曾一度想成爲職業的鋼琴演奏家。後來這個夢想並未實現，但音樂一直是她生活樂趣的來源。1918 年龐湯姆過世後，養母龐弗絲（Florence Pemberton）開始帶著佩琪到處旅行，過著舒適逍遙的日子，並認識許多政商名流，其中包括當時正在巴黎唸書的喬治亞王子艾尼可（Nicholas Abkhazi），也就是佩琪後來的丈夫。儘管龐弗絲和佩琪飽覽各地風光，但居無定所的生活總讓人覺得漂泊不定：當她們到過太多地方以致於失去新鮮感，不斷打包行李、拆卸行李的旅程也變得乏味無聊時，1929 年龐弗絲終於決定停止這段長達十年的旅行，並選擇上海作爲她們最後靠岸的港口。在龐弗絲的記憶中，上海是個享樂天堂；尤其一次世界大戰後歐洲百物騰貴，同樣的財富在上海卻足以維持有格調的時尚生活。

佩琪到達上海後，很快就參加上海英僑的社交圈，並認識了英國青年狄艾倫（Allan Tipple），經過一段時間的交往後，兩人於 1930 年 10 月 25 日結婚。由於兩家均爲滬上名流，《北華捷報》還詳細報導這場在聖三一堂（Holy Trinity Cathedral）舉行的婚禮，包括描述主婚人及新娘的華麗禮服。[17]根據佩琪的傳記作者高凱琳所言，這樁婚姻只是用來擺脫養母控制的手段：龐弗絲個性古怪，不易維持人際關係，控制慾也強，時時刻刻掌握佩琪的行蹤，旅行途中還堅持兩人住在同一個房間。成長過程中缺乏安定居所、同儕友誼及個人隱私，使佩琪格外渴望自由，因此當她們定居在上海，她很快就想建立自己的家庭。不過這段婚姻只維持了幾個月，離婚後的佩琪又回到養母身邊；1934 年龐弗絲中風，佩琪負起照護的責任，直到 1938 年 6 月 22 日龐弗絲病逝，佩琪才享有眞正的自由。[18]她回憶道：

> 我的生活開始有了不可思議的改變，有時候我覺得我一定是在做夢——可是對一個三十幾歲的女人來說，交朋友、參加令人愉快的聚會、穿優雅的衣服、有點認真地談戀愛，這些事應該都很平常。[19]

---

17 “Wedding: Tipple-Pemberton,” *North China Herald* (Shanghai), Oct. 28, 1930, p. 120.

18 *North China Herald*, July 6, 1938, p. 5.

19 這是艾佩琪與乾女兒通信時所透露的感想，參閱：Katherine Gordon, *A Curious Life*, pp. 114-115。

龐弗絲死後，佩琪爲自己做的第一件重要的事是改名字：她把自己的姓改爲「龐卡」（Pemberton-Carter），一方面記念對她有養育之恩的龐家（當然保留姓氏也確保她能繼承養父母所遺留下的龐大財產），另一方面則重新連結上她出生的卡家。儘管這兩家在上海已經沒有其他成員，新的姓氏並沒有實質關係上的意義，但這項舉動，不僅標誌著對過去沈重家庭責任的告別，也宣告新的身分，是一種有意識的認同選擇。

當佩琪準備展開人生的新頁，上海正處於「畸形繁榮」的狀態。1937 年 8 月，日軍在上海發動戰爭，租界政府立即提出撤僑警告，約有 3,000 名英國人撤至香港，另有美國人撤往馬尼拉，而法國人則撤至中南半島。[20]中日雙方經過三個月的纏鬥後，中國國軍敗退西撤，上海大半遂爲日軍所占領，只留下宣告爲非戰區的公共租界及法租界，在日軍包圍下形同孤島。由於兩租界相對安全，湧入大量難民；隨著上海戰事平息，外僑也陸續回到上海，使租界人口從戰前的 160 萬增至 1942 年的 240 萬，其中法租界居民更暴增了近八成。[21]大量的人潮意味著消費需求的提高，再加上社會瀰漫著對未來的不確定性，使得人們以消費來消解現實生活的焦慮感，因而造成「馬照跑、舞照跳」的孤島「榮景」。此時已完全不受家庭羈絆的佩琪選擇留在上海，畢竟這是她成年之後住得最久的城市，有親密的朋友及熟悉的生活環境；而母國卻在 1939 年起捲入歐戰，生父母方面的親人又久已失聯，似乎沒有理由遠渡重洋回去英國——事實上，就和許多上海外僑（Shanghailander）一樣，佩琪已將上海視爲自己的「家」。[22]

---

20 Greg Leck, *Captives of Empire: The Japanese Internment of Allied Civilians in China, 1941-1945* (Bangor, Philadelphia：Shandy Press, 2006), p. 39.

21 鄒依仁，《舊上海人口變遷的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頁 90-91。

22 根據 Robert Bickers 的研究，上海英僑的認同是多層次的，一方面他們很清楚自己是大英帝國的屬民，也完全由於英國租界的發展而致富；另一方面他們懷有「想像的地方認同」（local imagined identity），視自己爲上海的一份子。參見 Robert Bickers, "Shanghailanders: The Formation and Identity of the British Settler Community in Shanghai, 1843-1937," *Past and Present*, No. 159 (May 1998), pp. 161-211。

1941 年 12 月 8 日清晨，珍珠港被襲擊的消息傳到上海，日軍似乎已準備好接管公共租界，當天即排出龐大陣仗，以勝利之姿從虹口遊行至南京路，同時宣布英、美籍企業爲「敵產」，進行接收並撤換職員。12 月 10 日，日軍宣布銀行限制提存，外國存戶每月提款上限爲 2,000 元。[23]12 月 23 日開始辦理英美僑民財產登記，禁止擅自轉移產權；1942 年年初又進行外僑戶口登記，並分爲「敵性」與「非敵性」兩類，前者爲與日軍交戰的同盟國，即英、美、荷蘭、加拿大、比利時等 16 國，後者包括日本盟邦以及中立國家；當時法國已爲德軍占領，故被歸爲「非敵性」國家。[24]擁有英國籍的佩琪自然被貼上「敵性國民」的標籤。

爲進一步控制城市秩序，日軍於 1942 年 10 月 1 日起實施臂章制度，規定所有年滿 13 歲的「敵性」僑民均須佩戴紅色臂章，並以英文字母標示其國籍：A 爲美國，B 爲英國，N 爲荷蘭，其餘各國以 X 表示——佩琪的臂章代號爲 B2268。[25]10 月 15 日起，凡佩戴臂章者不得進入各種遊藝場所，包括戲院、電影院、舞廳、酒吧、回力球場、跑馬廳等——這成爲大規模拘禁「敵性」外僑的先聲。[26]

1942 年 1 月起，日軍陸續在東亞及東南亞領地內設置「敵國人集團生活所」，英文名稱爲“Civil Assembly Center”，全面性強制收押同盟國僑民。[27]這種制度源自於 1896 年，西班牙駐古巴總督爲鎮壓「第三次獨立戰爭」，將所

23 Greg Leck, *Captives of Empire*, p. 81.

24 根據陶菊隱的記載，日軍在 1942 年 1 月 20 日進行第一次英美僑民登記，當時公共租界共有英僑 2,764 人、美僑 404 人。第二次登記結果，英籍成年男僑 2,681 人、女僑 2,412 人，美籍成年男僑 700 人、女僑 477 人。Robert Bickers 的研究則指出，1942 年 2 月住在公共租界的英國人共有 2,779 人，其中一半以上是婦女與兒童。陶菊隱，《孤島見聞——抗戰時期的上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頁 153、156；Robert Bickers, “Settlers and Diplomats: The End of British Hegemony in the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 1937-1945,” in Christian Henriot and Wen-hsin Yeh eds., *In the Shadow of the Rising Sun: Shanghai under Japanese Occup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248。

25 Katherine Gordon, *A Curious Life*, p. 124.

26 Greg Leck, *Captives of Empire*, pp. 88-89.

27 「敵國人集團生活所」是官方文件使用的正式名稱，但一般也有稱爲「集中營」、「收容所」、「抑留所」者，爲行文簡便起見，本文使用「收容所」。

有平民遷移到受監視的地區，以與叛亂者相隔離。[28]兩次世界大戰期間，交戰國均設有此一制度，集中管理被俘虜的士兵及平民百姓。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軍在中國及香港境內共設置集團生活所 23 處，共關押在華外僑 13,544 人。由於上海爲中國最大的口岸城市，外僑人數最多，因此日軍設置的集團生活所亦集中於此，計有 8 處。1943 年 9 月，原屬軸心國的義大利與英美簽署投降停戰協定後，日本又另設專門關押義大利人的營區。根據 1944 年 9 月的統計，上海共拘禁敵僑6,200人，其中以位於今上海中學的龍華收容所規模最大，共收容 1,756 人，其中英國 1,584 人，比利時 39 人，美國 37 人，澳大利亞 32 人，加拿大 24 人，荷蘭 17 人，紐西蘭 11 人，南非 7 人，蘇聯 3 人，葡萄牙 1 人，挪威 1 人。[29]除了少數獲得交換遣返機會外，大部份被拘禁者在收容所裡待了2至3年多，直到戰爭結束後才重獲自由。這些被拘禁在收容所的人，不但與所熟悉的社交圈隔絕，也失去原有的工作。由於無法預知戰爭的結果，日常生活變成對不確定的未來的一種等待；他們待在收容所裡，只有一個簡單的目的：維持存在。

1943 年 3 月 2 日，佩琪收到通知，兩週後到指定地點集合前往龍華收容所，不過她因病延至4月5日才正式報到。爲了減少財政負擔，日方允許被拘禁的敵僑自行攜帶日常生活所需的物品，包括四季衣鞋、餐具、娛樂運動用品、書籍文具等，但每人最多只能帶 4 只行李箱。[30]佩琪帶了所有她能帶的東西：燉鍋、茶壺、杯盤、刀叉、咖啡壺、園藝工具、洗衣板、刷子、架子、床單、毛巾、蚊帳、肥皂、針線、罐頭食品，以及打發漫長時間的書本：三冊詩集、莎士比亞的《悲劇》（*Tragedies*）、《一個普通人的禱告簿》（*A Plain Man's Prayerbook*）、威爾斯（H. G. Wells）的《世界史綱》（*The Outline of History*）、俄語文法書、速記入門、縱橫字謎等，[31]當然還有許多紙、筆、以

28 William R. Everdell, *The First Moderns: Profiles in the Origins of Twentieth-Century Thought*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116.

29 熊月之，《異質文化交織下的上海都市生活》（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4），頁 472-473。

30 Greg Leck, *Captives of Empire*, pp. 122-123.

31 Peggy Abkhazi, *A Curious Cage*, pp. 52-53.

及本文的焦點——日記。

日記作為日常生活的實踐

佩琪爲什麼寫日記？在 1941 年 12 月 8 日的日記之前有一段說明如下：

> 當戰火襲擊我們這裡時，我正在閱讀威廉・夏伊勒（Shirer）的《柏林日記》。我試著想出一些鍛鍊腦力的方式，其中之一就是編輯每週大事。但差不多兩個月之後，我就放棄這個雄心勃勃的想法，有些原因很明顯，有些則是個人特質的因素。如果一個人不想失去清楚表達個人思想的能力，或記錄自己的所作所為——如果一個人在幾個月或幾年裡都無法寫信，這是一定會發生的——那就要用一本個人筆記本、或是寫一封永遠寫不完、也無法寄出去的信來自我操練。[32]

珍珠港事變發生時，日軍尚未宣布拘禁敵僑的措施，佩琪應該還沒想到她會面臨長時間無法通信的狀況，也不太可能預見她會在兩個月之後放棄編寫「戰時見聞」的計畫，因此這段文字不太像是日記的原始紀錄，而是日記出版時，爲了幫助讀者瞭解這份日記的來龍去脈所加上的說明。由於作者並未留下這段期間的日記稿本或其他相關紀錄，我們無法確知她在戰爭發生前是否有寫日記的習慣，但 12 月 8 日的日記一開始便記載著：「對我而言，戰爭始於清晨 6 點 50 分，飛機穿越房屋上空，發出激烈的響聲」。[33]用戰爭的開始作爲日記書寫的起點，標誌一個新的時代及生命經驗，的確意味著作者乃效法美國駐德記者威廉・夏伊勒（William Lawrence Shirer），試圖爲戰爭留下非官方性的個人見證。

日記形式有時也反映出日記主的寫作目的，有些人把日記當作「記事本」，提醒自己曾經做過或發生過的事；由於日常生活的高度重複性，使得這類日記偏向流水帳式的紀錄。例如，和佩琪同一時期被日軍拘禁在香港赤柱

---

32 Peggy Abkhazi, *A Curious Cage*, p. 23.
33 Peggy Abkhazi, *A Curious Cage*, p. 23.

收容所的柯利爾（L. A. Collyer），在日記中詳細記載每天的食物——有時菜單甚至是日記的唯一內容。[34]有論者認爲，這種「記事本」式的日記，反映的是日記主「自我辯護」的心態，證明她／他的時間與精力用在值得的地方。[35]不過柯利爾的例子恐怕正好相反，藉著記錄每天一成不變的食物和活動，表達他對百無聊賴、毫無意義的收容所生活的抱怨與抗議。

佩琪的日記很少出現這種流水帳，不論是收容所的環境、周圍發生的大小事件或個人心境，她都仔細加以描述，因此多半篇幅較長，最長者達一千多字，有時會謄錄整段《上海泰晤士報》（*Shanghai Times*）的新聞、[36]或是凍瘡患者的公告名單、[37]或是浴室使用規則等。[38]正如她自己所言，日記是訓練書寫表達的最好方式。值得注意的是，艾佩琪的日記似乎一直預設著「某位讀者」的存在，因此她的日記讀起來更像是對話，而非獨白。然而這並不意味著她是爲了出版而寫日記——根據她的傳記作者所言，艾佩琪要到 1973 年才開始考慮出版戰時日記。[39]相反地，日記的字裡行間透露著她與「讀者」之間的親密關係，包括共同的回憶及彼此間的辯論，顯然所預設的讀者應該是作者所願意分享生命經驗的對象，而非毫無關係的「大眾」。艾佩琪的好友、後來也協助她出版日記的傑克曼認爲，這位「讀者」指的是艾佩琪在上海最要好的朋友馬若迪及馬慕貞（Roderick/Muriel Mackenzie）夫婦，他們在佩琪養母重病時成爲她精神上的最大支柱。1939 年馬若迪退休，帶著一家四口遠赴加拿大維多利亞市定居。此後佩琪與馬慕貞書信往返頻繁，太平洋戰爭後，上

[34] L. A. Collyer’s Diary, copy of transcribed manuscript, in the special collection of the University of Honk Kong. 現存柯利爾的日記乃自 1945 年 1 月 1 日寫到 1945 年 9 月 9 日，打字稿複本藏於香港大學。

[35] Suzanne L. Bunkers, “Midwestern Diaries and Journals: What Women Were (Not) Saying in Late 1800s,” in James Olney, ed., *Studies in Autobiograph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p. 195.

[36] Peggy Abkhazi, *A Curious Cage*, p. 67. 該報創刊於 1901 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爲日軍接收，爲收容所內唯一被允許流通的報紙。

[37] Peggy Abkhazi, *A Curious Cage*, p. 112.

[38] Peggy Abkhazi, *A Curious Cage*, p. 72.

[39] Katherine Gordon, *A Curious Life*, p. 209.

海對外通訊中斷，佩琪即利用日記來維持此一通信習慣。[40]就像馬慕貞搬到加拿大後向佩琪報告新居的狀況，佩琪進入收容所後，也爲馬氏夫婦仔細導覽她的「新家」。

收容所的生活作息讓佩琪沒有充裕的時間寫日記。進入收容所之前，佩琪以爲她將會有很多時間「閱讀、學習、或編織」，但很快地她就發現自己「完全沒時間」：每天早上 6 點半起床梳洗，整理床舖，打掃個人床位，8 點半吃早餐，然後是宿舍的勞動服務，接著排隊取水，以及半小時的廁所站哨（toilet patrol），1 點 15 分吃午餐。下午整理營房環境 2 個小時，接著排隊領取下午的飲用水，6 點 15 分吃晚餐，8 點半洗澡更衣，10 點半熄燈就寢。這種按表操課的集體生活使佩琪難得有自己的時間可以寫日記——她進入收容所後的第一篇日記就被打斷了七次。[41]

不過整體而言，佩琪並不是個有紀律的日記作者，如附表所示，從太平洋戰爭爆發到二戰結束，三年多的時間一共寫 74 篇，而在收容所中的 790 天也只寫了 53 篇。[42]研究美國中西部婦女日記的歷史學家韓莉莎（Elizabeth Hampsten）指出，有時日記中的沈默比話語更重要，她建議讀者要以「創發性的耐心」來詮釋日記主所說的和沒說的。[43]在佩琪的日記中，寫得最頻繁的一段時間是太平洋戰爭的頭三個月，也就是她雄心壯志地想仿效《柏林日記》、爲戰時上海留下紀錄的那段時間，不過即使有這樣的企圖，她也沒能持之以恆。較好的情況是寫週記，有時一個月只寫一兩次，有時則留下長達數月的空白。甚至 1942 年 3 月、5 月及 1945 年 3 月的日記並沒有註記日期，而是對整個月生活的回顧。麥蘿瑞認爲，佩琪刻意在日記裡不留下紀錄，可以讓她

---

40 S. W. Jackman, “Editor’s Introduction,” in Peggy Abkhazi, *A Curious Cage*, p. 17.

41 Peggy Abkhazi, *A Curious Cage*, pp. 58-59.

42 艾佩琪於 1943 年 4 月 5 日進入龍華收容所，不過她從 3 月初收到通知後就開始預備，而且出版時，她刻意將日記分爲拘禁前與拘禁後二部，第二部就從 1943 年 3 月 4 日起算，故此處計算亦以此爲準。另外，太平洋戰爭雖在 1945 年 8 月 15 日結束，但直到 9 月 10 日同盟國人民才離開收容所，而艾佩琪的最後一篇戰時日記寫於 9 月 12 日。

43 Elizabeth Hampsten, *Read This Only to Yourself: The Private Writings of Midwestern Women, 1880-1910*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2), p. 4.

想像這些事未曾發生過，並褪入她「麻木而模糊的記憶中，是她等待遙遙無期的釋放時的生存策略」。[44]1942 年 2 月 10 日，她寫道：「我無法寫上個禮拜的事。郎鮑伯（Bob Lang）家發生很大的悲劇，他在電話裡極爲痛苦的聲音，叫我久久無法忘懷。一開始究竟是怎麼出錯的，這已經不重要，只是一個人居然可以被出賣、甚至被逼到要自殺的地步」。[45]這是佩琪日記中最短的一則，只有 51 個英文字，而且寫在事情發生後的一週，顯然佩琪還未能從震驚及忿怒中平復。郎鮑伯是佩琪的事業夥伴，一起經營養豬場。佩琪並未說明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對結果也隻字不提，甚至將近 40 年後日記出版時仍三緘其口，徒留讀者一頭霧水和滿腹疑問。

事實上，佩琪對於日記的空白並非毫無辯護，從 1943 年 9 月 27 日到 11 月 23 日停頓了將近兩個月的日記後，佩琪承認：

> 很難解釋為什麼從上一封信到現在隔了這麼久，一部份是因為閒懶（只是心理上的），一部份則因為，日復一日，當一個人太累時，一得空就什麼都不想做，只想睡到不省人事。還有就是一種空虛無用的感覺，也許你永遠也看不到這些信，尤其如果我們是因遣返而被釋放，那你一定看不到，因為如果憲兵隊連藥品上的標籤都不許人帶走的話，那他們一定不會讓一堆信流出去。不過如果你有機會讀這些信，還沒讀到這一封，你就會發現無聊乏味是這裡的生活基調。到目前為止，沒什麼直接的暴力事件，沒有刺槍、虐待或強姦等你想像被一個東方國家拘禁所會發生的事，只有單調、不舒服、塵土、擁擠，還有一種沒有意義的忙碌，只會耗盡你的精神，而且僅僅達到對乾淨及正常生活的基本要求。[46]

---

44 Laurie McNeill, "Performing Genres: Peggy Abkhazi's *A Curious Cage* and Diaries of War," *Canadian Literature*, 179, pp. 96-97.

45 Peggy Abkhazi, *A Curious Cage*, p. 35.

46 Peggy Abkhazi, *A Curious Cage*, pp. 105-106.

太平洋戰事爆發之初，許多上海的英美人士認爲，這場戰爭很快就會結束，即便後來被關進收容所，還是有人樂觀地認爲，隔不了幾個月，盟軍就會把日本打得落花流水，使他們重獲自由。佩琪對戰情沒那麼樂觀，因此她幾乎帶了所有的家當到收容所，預備「長期抗戰」，不過她仍然無法想像這裡的生活竟如此單調乏味。而日軍禁止被遣返者攜帶任何寫有文字的物品，這也讓佩琪覺得失去寫日記的意義與動力——即便她一開始就有心理準備，這些書信形式的日記恐怕永遠都無法寄出去，但她持續地寫，似乎意味著她仍抱一絲希望，能有機會和遠方的朋友分享這段經歷。然而如果預期會被日軍沒收，似乎也就沒必要浪費時間。

造成佩琪日記中斷的另一個原因是安全顧慮，包括她本人及其周遭的中西友人。從 1942 年 6 月到 1943 年 2 月，佩琪沒有留下任何日記，根據日記編者傑克曼所言，這是因爲日記主覺得「愈來愈不安」：日軍不但在無預警之下任意逮捕西人，而且經常以公然的攻擊及侮辱行爲來顯示其權力。[47]1942 年 11 月 5 日清晨，日本憲兵隊下令逮捕約 300 名「敵國人」，他們多半是上海政、商、宗教各界較具影響力的人，包括工部局的主管及 75 名巡捕房高級職員。許多人並不了解自己被逮捕的原因，有些人以爲是由於他們曾發表批評日本的言論，有些人認爲是日軍「弄錯對象了」。[48]佩琪的朋友葛約翰（John Green）也在逮捕之列，他曾擔任英國通濟隆有限公司（Thomas Cook & Son Ltd.）的遠東區總經理，儘管已經超過 60 歲，仍被日本人認爲是「重要人士」而拘禁在海防路拘留所——他們是上海第一批被拘禁的「敵國人」；這種情況自然使佩琪心生顧忌而中斷日記。

此外，佩琪也提到阻礙她寫日記的環境因素。她在龍華收容所度過的兩個冬天不但是她生命中的嚴冬，也正遇上上海有氣象測量以來最嚴重的寒害——天寒地凍使佩琪幾乎無法握筆，再加上生活的枯燥毫無變化，她完全

---

47 S. W. Jackman, “Waiting for Internment,” in Peggy Abkhazi, *A Curious Cage*, p. 45.
48 Greg Leck, *Captives of Empire*, p. 449.

提不起勁寫日記；1944 年 4 月 5 日若非因爲是進入收容所的「週年紀念」，恐怕她還會繼續「冬眠」。1944 年底的情況更糟，12 月 1 日出現華氏 28 度的低溫後就一路下降，連續 79 天低於冰點；營房的遮蔽效果十分有限，當屋外溫度華氏 17 度時，室內也只有 18 度。[49]

從佩琪的書寫頻率來看，寫日記並非規律的「日課」，因此形式上可能更像是標註日期的「札記」；從何種意義上我們可以把這樣的日記書寫視爲「日常生活的實踐」？德國史學家呂迪克（Alf Lüdtke）指出，日常生活的特點是具有高度的重複性，藉由例行性的習慣以緩解生活的不確定性，[50]也就是維持生活的穩定性與常態性。從這個角度來看，雖然佩琪並未每天寫日記，但週期性地記錄生活點滴，仍是她的一項生活習慣，儘管週期的長短可能並不固定。更重要的是，從戰爭一開始，她就定意把日記書寫列爲生活項目之一，因此寫日記是日常生活的「常態」；一旦中斷一段時間，她還必須「自我辯護」，解釋日記空白的原因，並再度回到生活「常態」，從而開始下一個寫寫停停的循環，直到戰爭結束。

日記作為微觀歷史的文本

日記文本的特點之一是第一人稱的敘事觀點，即便作者早已預想到可能有除了自己以外的讀者；有意識地使用日記這種文體，意味著強烈的自我表達與宣稱。在細讀艾佩琪的日記文本後，隱約可看見三個領域的書寫：個人領域、社區領域及政治領域，儘管三個領域並不一定完全獨立，但三種書寫各有不同的內在動機與目標，也因而影響到所選擇的題材，並且交織成以「自我」爲中心的微觀歷史敘事。

49 Peggy Abkhazi, *A Curious Cage*, p. 134.

50 Alf Lüdtke, “Introduction: What is the History of Everyday Life and Who are its Practitioners?” in Alf Lüdtke ed., *The History of Everyday Life: Reconstructing Historical Experiences and Ways of Life*, trans. Willism Temper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5-6.

在個人領域方面，佩琪的書寫乃在建構「自我」（selfhood）的獨特性，特別反映在刻意營造的自我意識、以及人我之間的空間界線與情感界線。佩琪的戰時日記分爲兩部，第一部自太平洋戰爭起至 1942 年 5 月，停頓了 10 個月之後，才又於 1943 年 3 月 4 日重新提筆，這是在接到收容所召集令的兩天後，可以看出她立志爲即將來臨的「新生活」而記錄。値得一提的是，日記的第一部似乎比第二部透露更多的恐慌與不確定性，可能因爲戰爭伊始，大部份人並不清楚日軍會以何種方式對待「敵國人」，對於未來更是茫然而不知所措。例如開戰當天佩琪寫道：「我從早到晚忙著撕毀個人信件——有些信相當珍貴，但現在都沒了——沒關係——從某些像是日記之類的東西釋放出來。到時候也不知道還能不能住在家裡，所以盡可能地清理掉不必要的東西似乎是個好主意」。[51]12 月 12 日則藉著對朋友傅亞力（Alex Forbes）的描寫，表達對未來的憂慮：

> 又到銀行排隊，領出第二筆 500 元。傅亞力排在我前面幾個，然後我們一起走路回家——覺得可以省下車資，不過可能比較會磨損皮鞋。看看戰爭把他搞成什麼樣？丟掉工作不說，同一條手帕用兩天，襯衫穿了四天。他看起來很糟糕，很難熬。〔他〕說他吃不下東西，但〔我〕勸他和我一起吃烤羊肉。在馬克及奧莉（Mac and Olive）家舉行生日晚宴，郎飽伯領我去那裡，我們得自備刀叉。氣氛很緊張，但還是個溫暖而值得紀念的夜晚。[52]

日軍占領公共租界後，爲避免出現擠兌狀況，規定銀行每天只對外營業 2 小時，每人每週最多只能提領 500 元。因此就算銀行帳戶裡有存款，也無法像過去一樣自由地吃喝玩樂。日軍對物質生活的限縮，不免令人擔憂個人生命及財產的安全。佩琪日記的第一部瀰漫著一股不安的氛圍，尤其當香港及新加坡陷落時，更爲明顯——事實上，日記的第一部便止於她獲知新加坡被日軍改名爲

[51] Peggy Abkhazi, *A Curious Cage*, p. 24.
[52] Peggy Abkhazi, *A Curious Cage*, p. 25.

「昭南島」的那天；一直等到收到集團生活所的召集令後，佩琪才恢復寫日記的習慣。[53]

有趣的是，第二部反映出超乎意料的平靜，尤其在第一篇近千字的日記裡，佩琪並未顯露對拘禁生活的恐慌，反倒覺得心裡有種「虛擬自由」（quasi-liberty），不必擔心遭到突如其來的威脅或攻擊。[54]更進一步，她把這篇日記當作「相信自己」的宣言：正當朋友們每週為著延遲收到收容所召集令而感謝上帝，她則相信自己不會被這樣的厄運擊垮：「雖然營房生活和我所想像的地獄差不多，但我不允許它淹沒我。相反地，如果我無法與敵人對抗並擊敗它，那我被摧毀也是活該」。[55]當她準備前往集合時，她勸僕人要勇敢，不要掉眼淚，因為「任何憂傷的表現只會讓日本人得到更多快感」。[56] 同時，在日記裡她也不斷藉著安慰她的虛擬讀者「不要為我難過，因為老實說，我一點也不在意……不要為我擔心」。[57]佩琪寫這些話時，她並不確定她的朋友是否真的有機會讀到這本日記，但可以確定的是，她自己必定是讀者，因此這些話也可以看成是佩琪對自己的勉勵。儘管這種自我安慰不一定可以完全消除作者對於未來的恐懼，可能也談不上對於現實環境的「抵抗」，但至少能夠暫時幫助她有勇氣接受迎面而來的挑戰，可以看成是身心靈巨大壓力下的生存策略。

收容所的生活最大的特徵是和一大群陌生人住在一起，所有在家裡原屬於個人性的作息活動都被集體化，沒有任何隱私。也許因為年輕時長期與母親同住一個房間，成年後的佩琪對於個人隱私特別敏銳，在準備收容所的行李時，刻意帶了一卷棉布作簾子，藉此保有一點「隱私的幻想」。[58]從收容所

53 Peggy Abkhazi, *A Curious Cage*, p. 37. 艾佩琪日記第一部的最後一天是 1942 年 2 月 19 日，她確認了新加坡被正式改名。之後有兩篇只有月份、沒有日期的記載，顯然是事後的回憶。
54 Peggy Abkhazi, *A Curious Cage*, p. 51.
55 Peggy Abkhazi, *A Curious Cage*, p. 52.
56 Peggy Abkhazi, *A Curious Cage*, pp. 54-55.
57 Peggy Abkhazi, *A Curious Cage*, p. 53.
58 Peggy Abkhazi, *A Curious Cage*, p. 52.

的舖位選擇上，也看出佩琪追求「孤獨」的企圖：她有兩個選擇，一是與其他 4、50 個人一起住在很大的木造營房，一是與 11 個人住在小一點的房間裡，她選擇了前者，因爲她認爲在一大群人中她「更有機會獨處」，尤其是她的床位在窗邊上，正對著廁所門——位於大營房的邊緣位置，以免成爲眾所矚目的焦點。儘管隨時都有人進出，「開門關門的聲響不斷，但宿舍本來就已經又吵雜又擁擠，多這一點聲音也沒太大差別」——當她坐在帆布椅，用洗衣板當桌子寫這些話時，旁邊有 25 個大人和 2 個小孩正在嘰嘰呱呱地聊天。[59]

對佩琪來說，與 4、50 個人同寢室也許還不太糟，但要和她們一起洗澡就是件無法忍受的事了。說起來，龍華收容所的設備並不算太差，公共浴室有水龍頭，不過限時限量的供水，且隔天才能洗一次澡，這讓佩琪的洗澡經驗是「說不出的精疲力竭」（unspeakably exhausting）：

> 準時和你同一梯次的其他 47 個女人一起進入浴室，脫掉鞋子，穿上木屐，走到置物櫃，脫掉衣服。聽到哨音，走到淋浴區，哨音一響，開水龍頭一分鐘，又一聲哨音，關水龍頭，抹肥皂，哨音，開水龍頭沖乾淨，哨音，走出來穿衣服，再把木屐換成鞋子……全部完成，從進浴室到離開的哨音，整整 20 分鐘。老天！這和過去用梔子花浴鹽泡一個小時的熱水澡真的差太多了；沐浴再也不是「放鬆時間」。[60]

後來佩琪決定趁大家未起床前，用傳統老方法，在浴室的水槽裡用桶子和水壺洗澡，並把床單掛在繩子上，以阻絕公眾的視線。[61]

佩琪保護隱私的行動還表現在她對營房勞動服務的選擇及意見上。敵僑收容所的運作大體上仰賴被拘禁者本身的維護，日軍主要的角色是防止逃逸及維持秩序，其他日常生活的事務，如煮飯、分配水和食物、修繕、醫療、甚至種菜、養牛等工作，均由被拘禁者擔任。一到收容所不久，佩琪就被指派打掃廁所、疏通水管、廁所站哨等工作。從小養尊處優的佩琪大概從來沒做

[59] Peggy Abkhazi, *A Curious Cage*, p. 56.
[60] Peggy Abkhazi, *A Curious Cage*, pp. 71-72.
[61] Peggy Abkhazi, *A Curious Cage*, p. 69.

過這些活兒，但她對於半小時的廁所站哨工作還不太討厭，因爲這是少數她能「獨處與默想」的機會。[62]

在所有的勞動服務中，佩琪最喜歡的是照顧菜園。原本這個選擇多少有點偷閒的心態：這個工作只要遇到雨天就可以休息，但削馬鈴薯可就沒有假日了。剛開始的那幾天，沒有園藝經驗的佩琪不但抱怨手酸背痛，而且還感嘆她「蒼白的音樂家的雙手，因爲種菜而曬傷起繭，眞是又可笑，又可悲。除了剛洗完衣服，指甲從來沒乾淨過」。[63]不過一段時間之後，她逐漸感到這項工作的樂趣，倒不是因爲工作的本身，而是它所引發的一種奇特的「逃離」心理狀態——逃離生活的單調乏味，逃離永無止盡的叨絮，逃離熙來攘往的人群，逃離受到監控的生活方式。她發現勞動所帶來的身體疼痛，竟能讓她的思緒飛向她所愛的事物——所學過的詩句，所聽過、彈奏過的樂章，也讓她回想起過去與閨中密友所度過的快樂時光。只有這樣才能讓生活繼續下去。[64]

佩琪不但試圖在集體生活中尋求個人隱私，更想辦法建立「眞正屬於自己」的空間，布置臥舖便是她打造「個人性」的第一項工程。由於她的床位在門邊，因此多了 18 吋的牆角空間，她釘了兩個掛鉤吊衣服，架了層板放書，還用她的和服當簾子以免招灰塵。牆面上的架子則用來放熱水瓶、咖啡壺、炒鍋、碗盤、鏡子、肥皂、墨水、指甲刀等用品。她最得意的作品是藍白格紋的窗簾，搭配藍色的床單及枕頭套，再加上她的藍色睡衣，使她成爲宿舍裡的「時尚領導者」。佩琪承認在這樣的環境下炫耀創意挺悲哀的，但她還是有點得意，「至少有一件事是和其他 47 個人不一樣的——隱約希望個人可以對抗那股被大眾淹沒的力量」。這些巧思的效果不僅是對個人能力的肯定，也增加身體的愉悅感。「晚上當我滑進一片湛藍之中，想像自己被清涼的水包圍著，潔淨、清新的感覺，就連呼吸的空氣都是甜的」。這對於睡在廁所門邊、

[62] Peggy Abkhazi, *A Curious Cage*, p. 59.
[63] Peggy Abkhazi, *A Curious Cage*, p. 67.
[64] Peggy Abkhazi, *A Curious Cage*, pp. 78-79.

時時刻刻會聞到臭味的佩琪來說，尤爲需要。[65]

此外，她還在她床位的窗外開闢了一座 6×3 呎的私人花園，種有番茄、甜菜根、薄荷、荷蘭芹、南瓜、美人蕉、黃瓜和一棵小樹。儘管她必須從池塘提水灌溉，但「擁有的感覺非常強烈，也很令人開心」。她甚至插上「不要把水倒在這裡」的警示牌，以保護這些幼苗。可是不出一星期，下雨淹水及膝，頓時佩琪的心血付諸流水，「就好像我的個人財產全都完了」。[66]

對佩琪來說，安靜獨處是追求隱私的表現，更是對低於標準的收容所生活的拒絕妥協。被拘禁在收容所的人，不乏音樂家、畫家、運動員（在山東濰縣收容所中還有一位奧運金牌選手），許多人都樂意一起籌備表演或比賽，這些娛樂活動不但可以調劑沉悶的生活，練習和表演也成爲被拘禁者的生活目標和期待。[67]不過，熱愛藝文活動的佩琪卻不能忍受「低品質的替代品」，一次留聲機音樂會的經驗相當能說明她的感覺：

> 昨晚我們有一場留聲機音樂會，曲目有巴哈、海頓、貝多芬，真是令人感到清新無比。在過去一個禮拜，全營區都充滿“South American Way”和“Because”的歌聲，或高唱，或低吟，或吹哨，齊唱、獨唱、重唱，優雅的、慢板、快板，合拍的、走調的，簡直就是各種音樂會的回聲。巴哈音樂的平靜喜悅總是讓我印象深刻，溫暖、快樂而單純的信心，聰明撒種後伴隨快樂收割，範圍寬廣卻毫不累贅，清楚又恰如其分，正是集中營生活考驗的一劑良藥。在音樂裡，我可以完全忘記硬板凳、水泥地、被染紅的棉花棒堵塞的水槽（音樂會是在餐廳裡舉行）、以及幾百張看起來傻傻的臉孔，包括我自己在內，如果我可以看到的話。一切都消失了，就好像一個人又可以重新掌握命運。但是結果總是最可怕的沮喪。我無法想像這麼美麗的東西會有這種結

65 Peggy Abkhazi, *A Curious Cage*, pp. 66-67, 75-76.
66 Peggy Abkhazi, *A Curious Cage*, pp. 87-88.
67 Greg Leck, *Captives of Empire*, pp. 255-260, 273-282.

果，也許這都是因為性格上的精神缺陷。[68]

對於從小接受正統音樂訓練的佩琪來說，美好的音樂不但與收容所餐廳的硬體設備完全不搭調，音樂會後必須面對收容所的冰冷現實所帶來的是更強烈的失落感。正如她拒絕參加兩週一次的週六舞會，因爲她發覺對於一個 40 歲的中年女人，「水泥地板、兩台五絃琴、一台鋼琴、缺少男伴，這些因素加起來讓我對這種舞會提不起勁。我需要的是鮮花、禮服、拖鞋、珠寶、音樂、燈光和舞伴——你知道中年人的要求有多困難、多嚴苛。既然這樣，我就在這個幾乎被廢棄的宿舍裡，開開心心地期待接下來幾個小時的安靜」。[69]

可能因爲這種「追求孤獨」的心態，佩琪在日記裡較少談到她的人際關係，在兩年多的收容所日記中，出現的人名不到 20 個，而且多半以「旁觀者」的角度敘述某些事件時，才會提及這些名字。在日記中，她有時會報導宿舍生活的「插曲」（vignette），如室友的特殊習性，或羨慕新室友的乾淨外表及美味食物等，不過這些描述多半「事不關己」，佩琪也就比較願意揭露其姓名。對於與自己生活較多交涉的人，反而隱去其明確身分，例如和她一起分享食物的鄰居，僅示其名字的開頭字母，而菜園的工作夥伴，則稱之爲「老闆」。最耐人尋味的是佩琪日記的插圖作者石莉安（Lilian Schlee）及費德茹（Deirdre Fee），她們都來自英國，與佩琪同一梯次進入龍華收容所。兩人對收容所的繪畫，後來成爲佩琪日記出版時的插圖，其中石莉安還是佩琪第一次婚姻的伴娘，而她所畫的主題正是佩琪的臥舖角落——也就是佩琪所極力維護的「私有空間」，以及給予佩琪收容所生活極大安慰的小貓咪。石莉安及費德茹的收容所畫作現存在加拿大維多利亞大學的《艾氏檔案》中，顯然被當作佩琪的遺物收藏，很可能是她們送給佩琪的紀念品。[70]這樣關係親密的兩

---

68 Peggy Abkhazi, *A Curious Cage*, p. 84.

69 Peggy Abkhazi, *A Curious Cage*, p. 88.

70 石莉安及費德茹的畫作並未標上日期，因此無法確定是在收容所內的畫作，或是離開收容所後的回憶，不過她們對於龍華收容所的描繪與當時其他人的畫作並沒有太大的出入，因此即便是事後的印象，也相差不遠。重點是她們應該在收容所內已認識，卻從未出現在佩琪的日記敘述中，足見是一種刻意的書寫選擇。

位朋友，在日記中卻完全不見其蹤跡。

另外一位對佩琪收容所生活至關重大的朋友是「葉端生」（音譯）。[71]根據日軍規定，被拘禁的敵僑可以接受上海親友透過紅十字會所送來的食物及用品包裹，每人每月限額 10 磅。佩琪在龍華收容所期間，主要由中國友人葉端生代爲保管財物並按月寄送包裹；到了 1945 年初，日軍禁止中國人寄送紅十字會的包裹給敵僑，葉便藉其他非交戰國僑民的名義，繼續寄送包裹給佩琪——而她過了兩個月才明白，葡萄牙裔奧利維（Oliveira）先生及西班牙裔艾瓦瑞（Alvarez）太太所寄來的包裹，其實都是葉端生的忠心與創意。[72]到了戰爭結束，葉端生是第一個到收容所探視佩琪的人，並且當她獲釋後，又安排她住在一家私人醫院裡，直到 10 月 13 日搭上遣返輪船拉瓦加號（Lavaca）——佩琪進入收容所前已處分大部份的財產，因此離開龍華時已無家可歸；而當時上海不但一房難求，加上通貨膨脹的結果，葉端生代售財產所剩的現金也不夠支付昂貴的旅館費用，葉只得動用關係安排佩琪「住院」。[73]後來佩琪移居加拿大，與葉端生中斷音訊，但她對葉的恩情一直銘記在心，終於在 1981 年與葉家聯繫上，可惜葉端生收信一週後便病逝上海，沒機會親筆覆信，最後由其遺孀代爲回覆。佩琪把葉太太的信附在出版的日記，爲她的戰爭故事畫下句點。儘管佩琪信賴且依賴葉端生，直到 1945 年 3 月，她才第一次在日記中提到葉的名字，且以字母 T.S.代表，並等到確定日本投降後，佩琪才正式介紹這位忠心的朋友。

佩琪在日記中刻意避談關係密切的友人，這當然是保護自己和對方的做法，正如後來她對這段時間的回憶：「我們什麼也不寫，舊的信件、照片、通訊錄通通都銷毀。名字、紀錄愈少，擔心被日本憲兵隊質問的可能性就愈小。日本憲兵隊就相當於希特勒的蓋世太保」。[74]不過當她在收容所的時間愈

---

71 日記內文稱之爲 T. S. Yieh，根據日記之後的說明，T. S. 的漢語拼音爲 Ye Duan-sheng。

72 Peggy Abkhazi, *A Curious Cage*, pp. 136-137.

73 Peggy Abkhazi, *A Curious Cage*, pp. 147-148, 151-152, 155.

74 S. W. Jackman, “Editor's Introduction,” in Peggy Abkhazi, *A Curious Cage*, p. 16.

長，對安全顧慮的警覺性似乎愈弱。前述談到兩位分享食物的室友，一開始她只以 K 與 E 兩個字母代表，幾個月以後，在日記中就直呼其姓名，毫不隱諱。[75]至於戰事爆發不久就被拘捕的友人葛約翰，她在 1942 年 2 月 18 日之後就不再提到他的狀況，但 1944 年 4 月底，日軍允許敵僑離營探視被關在海防路拘留所的親人，佩琪在日記中對於未能獲允前往，深表遺憾，但此時她似乎並不怕公開承認與葛約翰的友誼。[76]一方面可能因為在收容所已經是被拘禁的狀態，最糟也不過如此。另一方面，截至目前為止，一年多以來龍華收容所並未發生虐待敵僑或暴力事件，這也使佩琪逐漸放鬆戒心。

佩琪的日記除了記錄個人的心情與作息之外，也對整個營區環境及團體生活韻律有生動而豐富的描述，亦即上文所稱「社區領域」的書寫。事實上，她對龍華收容所的現代設施，印象頗為深刻，包括校舍、電燈、抽水馬桶、自來水等。不過她最關心的還是基本的食物和供水，不但記載三餐食物的內容，以及排隊打菜、取水、洗碗的情況，還透露如何可以爭取較多食物和用水的各種祕訣；[77]正如佩琪承認，「食物是我們唯一的喜好；我們可以永無止盡地思念著、夢想著、談論著；我甚至注意到營房裡至少有兩個人把食譜列為他們最喜愛的文學形式」。[78]他們對吃已經到了「著迷」（obsession of eating）的地步。[79]其他如娛樂及社團活動、寢室內的笑鬧閒聊、收容所內流傳的謠言等，都在佩琪的報導之列。

在這些彼此不相連貫的生活片段中，呈現出佩琪對個人與集體之間的關係有種微妙而複雜的態度：一方面來說，這是既依存又競爭的關係。從一進收容所，她就十分佩服許多白領階級（尤其是英國人）能夠放下身段，男人幫忙修馬路、撿垃圾、建爐灶、燒熱水、煮大鍋飯、宰殺牛羊，女人則種菜、

---

75 她們是石凱特（Kate Shekury）及石伊娜（Ena Shekury）姐妹，英國人，與艾佩琪同時進龍華收容所。

76 Peggy Abkhazi, *A Curious Cage*, p. 119.

77 Peggy Abkhazi, *A Curious Cage*, pp. 55-57.

78 Peggy Abkhazi, *A Curious Cage*, p. 62.

79 Peggy Abkhazi, *A Curious Cage*, pp. 81-82.

煮飯、教書、看護、打掃、洗菜、縫補、分配用水等，由於他們的努力，使收容所得以維持較有次序的生活條件。[80]她特別提到一件令人莞爾的軼事：收容所內有位幼稚園老師帶著全班在戶外上課時，對著學生大喊：「你們是要現在專心上課，還是想要長大後當個撿垃圾的？」當她說這話時，正好兩個上海最有名的洋行大班拖著垃圾從旁邊走過，咯咯笑著這諷刺的情況。當佩琪描述這個故事時，並未帶著尖酸或自憐的口吻，而是平靜地說：

> 營區生活就是這麼大的變化。要是另一個大班被他從前的水手督察下令，在半小時之內從卡車上卸貨，這對所有人來說都是新鮮的經驗。我不知道戰後的情況會如何，所有這些事應該帶來寬容與理解，只要我們不會回到過去的老路。[81]

佩琪本身也來自富裕家庭，從小到大所有粗細活均由別人代勞，因此對安於撿垃圾的洋行大班充滿敬意，對於維持收容所生活運作所必要的社會階級重組或角色調換，也有較多的同情與理解。事實上，不只是佩琪，許多在龍華收容所待過的人都同意，正是因爲收容所內有一批不計較身分地位、願意付出的人，才讓他們能夠熬過這段艱難歲月。[82]

同時，由於收容所是八方雜處之地，特別在佩琪的營房裡，53 位室友來自比利時、荷蘭、俄羅斯、英國、南非、葡萄牙、法國、美國等國家，甚至有荷日混血兒，[83]年齡層從 13 到 60 歲，分屬不同階級，擁有不同的生活習慣與宗教。她認爲這是個操練「人文教育」（liberal education in the humanities）的好地方，尤其是使「難相處」的少數人被「正常」的多數人所同化。[84]

當然，收容所生活並不總是如此和諧，爭吵、打架時有所聞，而且經常

---

80 Peggy Abkhazi, *A Curious Cage*, p. 69.

81 Peggy Abkhazi, *A Curious Cage*, p. 80.

82 "Interview Records of R. Mabel Haynes," OH2317, in the Center of Oral and Public History, 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at Fullerton.

83 理論上非同盟國國民如俄國、法國、葡萄牙不需被強制拘禁，但有些人因不願與同盟國國籍的配偶分開而自願進入收容所。

84 Peggy Abkhazi, *A Curious Cage*, p. 65.

只是爲了瑣事。佩琪提到營房裡發生兩次「大戰」（superb fights），一次起因是兩位女士對「打鼾」一事意見不合而大打出手；另一次則是某人爲了鄰居的床移位「超線」2 英吋而上演全武行。[85]這類的衝突及紛爭反映出，被關押者長期處於沒有個人隱私的集體生活型態，再加上對於未來的高度不確定感，導致情緒緊繃而容易失控。事實上打架可能還算比較「正面」的發洩方式；愈到後期，意志消沉而自殺的案例增多。1944 年 5 月，佩琪營房裡一名俄國女子因爲長期失眠，再加上感情問題，試圖自殺。同樣可悲的是，佩琪對這樣的事已經痲痺到顯露不出任何同情，反而抱怨自殺者打斷她們的休息時間，又爲早就工作不勝負荷的醫護人員平添不必要的額外負擔。[86]

另一方面，儘管集體對個人產生制約力量，個人的決定有時也對集體造成重大影響，甚至由集體承擔後果，這特別反映在收容所中的逃亡事件。佩琪一共記錄三次逃亡事件，分別發生於 1943 年 9 月底、1944 年初及 1944 年 8 月。佩琪其實對「逃亡」抱持著曖昧的想法：她和逃亡者一樣，都想離開這個幾乎令人窒息的收容所，因此他們的行動是可理解的——她甚至想像營友可以逃到重慶，透過廣播向世人宣講他們如何英勇地逃離龍華收容所。[87]然而一旦發生逃亡事件，意味著遵守規定留在收容所的人必須爲別人的越軌行爲受到懲罰——這正是每次發生逃亡事件後佩琪的立即反應，而她也不憚其煩地把所有的懲罰項目抄錄在日記裡。[88]

此外，當社區生活牽涉到「敵人」時，集體中的某些角色很容易引起道德爭議性，特別是被指派擔任日軍與關押者之間的中間協調者。龍華收容所人數約 1,200 至 2,000 人，然而全營區只有 35 名日本憲兵，因此大部份的管理工作仰賴被關押者執行。[89]收容所內成立各種委員會，負責日常生活事務的分配與執行；個別關押者不得直接向日軍指揮官報告，只能透過相關的委員會

---

85 Peggy Abkhazi, *A Curious Cage*, p. 106.
86 Peggy Abkhazi, *A Curious Cage*, p. 120.
87 Peggy Abkhazi, *A Curious Cage*, p. 113.
88 Peggy Abkhazi, *A Curious Cage*, pp. 104, 112, 124-125.
89 Peggy Abkhazi, *A Curious Cage*, p. 63.

代表向日軍反映。這種作法大大減輕日軍的管理責任及行政成本，不過扮演日軍與被關押者之間緩衝角色的委員會就得承受來自雙方的壓力。[90]對佩琪來說，爲了保護集體而「爲日軍服務」就是極大的兩難。有一次，放在大樓走廊的行李箱被人用萬能鑰匙打開，日軍懷疑竊賊來自女生宿舍，因而設立女警隊。佩琪在日記裡表示：

> 天曉得我多討厭遺失任何一件東西，它們是如此重要，又如此無可取代。但我更不願意捲入「是否要把犯人交出來」的矛盾裡。有人說必須要保護全體，可是我又怎麼能把人交給日本人「審問」及處罰呢？[91]

佩琪的矛盾主要由於「敵人」與整個社區共享對「秩序」的期待，當社區達成這項要求時，敵人亦同蒙其利，甚而使敵人藉由懲治肇事者得以強化其權威，因而使「維持秩序」在敵我界線分明的情況下成爲道德問題。從某個角度來說，佩琪之所以如此努力建構自我的獨特性，也是對集體的潛在質疑。

佩琪關於政治領域的書寫，主要體現在她對政治權力的認知與感覺。佩琪的收容所經驗直接源自於戰爭，或更廣義地說，是國際政治衝突的結果，不過三年多來的日記裡，她對國家或政治議題的論述並不多，特別是對戰爭的合理性及必要性議論甚少。這可能是因爲整場戰爭是由日本挑釁而起，盟軍參戰是正當防衛，因此佩琪並未將這段受苦經驗歸咎於國家；但她對於英國軍隊「不堪一擊」的確有些失望。珍珠港事變後，日本隨即攻取盟軍在東南亞的領地：在上海，日軍開進公共租界時幾乎未遭到任何抵抗；駐紮香港的英軍只守了 17 天；到了 1942 年 2 月 15 日新加坡亦陷落。兩天後，佩琪在日記裡寫道：「新加坡丟了，很難接受這個事實，雖然 C 早在幾星期前就預言它的陷落。聽到這個消息，我們都陷入一片愁雲慘霧中。我們生來就是成事不足、敗事有餘嗎？當我們說它是一座堅固的島嶼堡壘時，只是虛張聲勢嗎？」[92]然而作爲一名身處大英帝國邊緣的小老百姓，佩琪無力改變任何事，也只能

---

[90] Greg Leck, *Captives of Empire*, p. 239.
[91] Peggy Abkhazi, *A Curious Cage*, p. 80.
[92] Peggy Abkhazi, *A Curious Cage*, p. 35.

在日本佔領區內繼續過她的日子。

事實上，在日本佔領區、甚至在收容所裡，佩琪並未明顯感受到英國政權的保護。由於日本與英國處於敵對的交戰狀態，斷絕正式的外交協商管道，必須透過第三方斡旋；英國委任瑞士爲代表，因此佩琪在日記裡，經常提到瑞士駐上海領事馮泰寧（Emile Fontanel, 1895-1979）的名字，每次他到收容所探視，總爲他們帶來物質和心靈上的支持。此外，紅十字會也扮演重要角色，雖然這是非官方組織，但英美各國所發放的救援物資、個人信件以及每個月上海友人所準備包裹往往透過紅十字會寄送。至於英國政府對於被日軍拘禁的本國人民，非但較少積極援助，其措施也引起不滿。原本大家以爲慰問金是政府所提供的補貼（allowance），後來才確定這是一筆需要償還的貸款（loan），這讓佩琪對於這筆數目不多的金錢缺乏期待，連帶對英國政府也失去熱忱。[93]

至於對敵國日本，佩琪絕少正面批評，即便對憲兵隊極度恐懼，也很少在日記中表露，甚至當新加坡陷落後，日軍趾高氣揚地炫耀，她只是輕描淡寫地說：「日本人對他們的勝利極爲得意，這是可理解的，他們正計劃在這裡以及日本全國各地舉行大規模的勝利遊行，不過他們仍然表現得一樣客氣而得體（politeness and correctness），這是自從他們接收這個地方以來，與他們接觸的特點」。[94]一直到後來出版日記前，她才說出當時內心的不安：

> 有一次我要穿越虹橋鐵路線到養豬場，還好有蘇西（Susie）（我的狗）的道德支持，當我靠近鐵路線時，有一大群中國人在附近，日本衛兵用竹子打他們——大概有二十幾個——把他們推到一間小警衛室，那裡最多只能容納 5 個人。警衛室旁邊有個不幸的農夫，脖子上纏著鐵線，吊在樑上，他的腳趾剛剛著地。我太膽小而不敢回頭，猛踩腳踏車盡快回家，嚇得不敢過問。〔經過崗哨時，〕我下了腳踏車，拿出

93 Peggy Abkhazi, *A Curious Cage*, p. 86.
94 Peggy Abkhazi, *A Curious Cage*, pp. 35-36.

> 通行證，祈禱著守衛是個愛狗的人——他很喜歡在車後籃子裡的蘇西，還叫他的同伴出來，然後一陣輕拍撫摸蘇西的聲音，就放行了。傍晚當我回去時，警衛室還是擠滿了人，農夫也還站在那裡——我對道德問題的無能為力，實在沒什麼好得意的。[95]

這個故事並沒有包含在佩琪原來的日記裡，而是由日記編者轉述，顯然強烈的恐懼感使她不敢吐露眞實的感受，卻在將近 40 年後還記憶猶新，歷歷在目。

不過儘管如此，佩琪隱約仍抱持著西方人的種族優越感，把日本想像成「凶殘、野蠻卻又幼稚」的東方國家，一方面驚訝於收容所並未發生預期中的虐待或強暴事件，另一方面則嘲弄日軍的自欺欺人。例如，她認爲日軍堅持拒絕使用「集中營」一詞，改稱爲「集團生活所」，就是掩耳盜鈴的做法：「日本人喜歡用奇特的名字，他們天眞的相信，只要你爲某樣事物取了新的名字，它的性質就會改變。根據他們的說法，我們並不是被關押（interned），也不許在信中使用這類令人不悅的字眼」。[96]有時她也嘲諷收容所內的各項規定，迂迴地消遣日軍、甚或說是自我消遣。日記中曾引述一段「令人愉快的」（delightful）公告：

> 「集團生活所是最好的家，住在裡面的人必須愛護它、珍惜它。所有人都要照顧好自己的健康，與他人和平相處。不應該發生任何爭論、吵架、擾亂或其他不當的舉止」。這些說得都很對，不過最後一點是，我不知道什麼時候才有機會表現，除非是在一堆磚塊裡……廢墟裡的愛，最新的。[97]

顯然佩琪對於日軍這種「愛家」論述完全無法苟同。

然而佩琪的敵我意識並未令她完全失去對人性的公允評價，特別是她對收容所指揮官林知彥（Tomohiko Hayashi） 的描述。大體上說，林知彥被公認是仁慈和善的好人。他曾出使英國，二次大戰初期也被拘禁過，但英國十

---

95 S. W. Jackman, "Waiting for Internment," in Peggy Abkhazi, *A Curious Cage*, pp. 45-46.

96 Peggy Abkhazi, *A Curious Cage*, p. 51.

97 Peggy Abkhazi, *A Curious Cage*, p. 59.

分禮遇他，讓他享有外交的尊重和福利，因此當他被遣返回國、擔任龍華指揮官時，他也以同樣的態度管理收容所，容許敵僑有限度地享有福利。佩琪日記中林知彥的形象大多十分正面，有一次收容所內出現嚴重爭議，討論是否需要在收容所內種樹，贊成者希望藉此改善光禿禿的環境，以便在盛夏時有樹蔭遮蔽，反對者則認爲這是浪費錢的做法，「不如拿來買奶粉」。最後贊成種樹的陣營勝出，只是這些總值2,000元的樹木並未花到他們一毛錢，一半來自英國居民協會（British Residents' Association），另一半則來自林知彥的一名日本朋友[98]——捐贈者應該是從林知彥知道這個需求。此外，1943年9月26日，龍華收容所發生第一次逃逸事件，佩琪原本以爲全營的人都要遭受嚴厲的處罰，不過指揮官只下令禁止靠近鐵線圍籬，並對逃逸者的妻子及朋友進行審訊。1944年8月19日又發現3名敵僑逃逸，處罰是禁止看報、禁止攤販進入、禁止收信、禁止音樂會及娛樂活動、一天只供應兩餐、禁止離開宿舍。這是有始以來最嚴厲的處罰。兩天後，S被審訊5小時之久，突然掙脫審訊官，逃到足球場上，並痛毆兩名靠過來的守衛，直到第三名士兵過來抓住了 S，並把他打得頭破血流。這一幕激起敵僑的反抗意志，於是上前把三名士兵團團包圍，合力救回S，將他送醫急救。意外地，除了S之外，所有參與這次抗爭行爲的人僅被罰禁足，而 S 也只被輕判一個月的監禁。由於一連串的逃逸事件及這次騷亂，林知彥被降職，調離龍華收容所。[99]不過另一方面，佩琪承認她從來未曾信任過林知彥，特別當她感到憤怒時，就很希望能夠聽到他訴說在倫敦被關押在沙威飯店（Savoy Hotel）的痛苦經歷，做爲心理補償。[100]

麥蘿瑞認爲，佩琪強調、甚至過度美化指揮官林知彥的仁慈形象，是因爲「自我檢查」（self-censorship）的心態，擔心一旦日記被沒收，其中任何

98 Peggy Abkhazi, *A Curious Cage*, p. 85.
99 Peggy Abkhazi, *A Curious Cage*, pp. 124-131.
100 Peggy Abkhazi, *A Curious Cage*, p. 63.

批評同伴或日軍的文字會爲自己惹禍。[101]不過這可能不只是佩琪自我保護的措施，其他被拘禁在龍華收容所的敵僑也指出，當某人說他在家有鋼琴、有書，林知彥想辦法把鋼琴和書搬進收容所，甚至允許把家庭農場裡的牛羊動物搬過來，因此龍華收容所有了個小農場。[102]這些口述訪問乃於 1990 年代初進行，受訪者已經沒有設防的必要——事實上，如果日本指揮官的態度眞的冷酷嚴峻，他們大可以藉此機會控訴、甚或「揭秘」，這比稱讚日本指揮官更能博得公眾的注意及同情。2013 年 6 月 6 日，加拿大國會議員藍慕瑞（Murray Rankin）還在國會中公開表揚林知彥擔任龍華收容所指揮官時所表現的人道精神。[103]因此佩琪對林知彥的正面描述不盡然是害怕檢查的結果。

從佩琪對政治領域的書寫，可供我們再思「民族主義」的問題。戰爭一向被認爲是鼓動民族主義最直接、最有力的場域，可是在佩琪的日記中，以國籍爲界線的民族主義色彩並不那麼強烈。一方面，收容所的環境乃超越國界，所有同盟國、甚至少數非同盟國的人民、以及與之通婚的日本僑民也混雜而居，在日常生活的層次上休戚與共；國籍只有在發放「慰問金」或提供物資這類以國家力量爲基礎的福利議題才顯得相關。另一方面，佩琪本身的國家認同就極爲模糊：出生於上海、在英國受教育、旅居世界各地、最後又落腳上海；對她而言，國籍是法律及政治身分的標記，卻不一定是民族感情的歸屬，從而也限制了民族主義的影響力。

在艾佩琪的日記中，明顯存在「集體」與「私我」兩股力量互相拉扯，收容所制度就是國家意志將個人推向集體的具體實踐。在日軍的命令下，佩琪被迫離開自己的家，住進沒有隔間、沒有隱私的收容所，甚至個人身分也從姓名改爲序列號碼（晚點名時日本衛兵只叫號碼，佩琪是 20/61），這不僅爲了管理上的方便，也是在集體意識下泯除個人獨特性的做法。而除了敵我陣營

---

[101] Laurie McNeill, “Performing Genres,” p. 92.

[102] “Interview Records of R. Mabel Haynes,” OH2317, in the Center of Oral and Public History, 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at Fullerton.

[103] “Statement in the House-Second World War Bravery,” http://murrayrankin.ndp.ca/statement-in-the-house-second-world-war-bravery (accessed February 2, 2014).

外，收容所內也存在其他形式的集體，有些有較明確而持久的界線（如國籍、族群），有些只是一時需要的集合（如意見派別）。一般而言，集體的聲勢浩大，個人往往難以招架，在收容所的環境下尤然。因此，佩琪建構自我的努力也就格外令人注目，從區隔空間到隱身孤獨，她拒絕被淹沒於無分別的「大眾」之中。不過佩琪的自我建構，並不純然是對集體的抵抗，有時是種妥協，特別是對日軍的描述語多保留，甚至選擇沈默，都是艱難情況下不得已的書寫策略。

日記作為自我展演的形式

日記原是一種「私密檔案」（intimate archives），是作者爲了保存記憶所留下的紀錄；有時即便採取書信的形式，其主要目的乃與密友分享生命經驗，屬於私領域的活動——文具商人爲日記本加上精緻的鎖鑰，進一步突顯日記私密性的認知與印象。於此相對的潮流則是日記的公開與出版，尤其是商業出版社對此道之興趣，反映出某種「窺探隱私」的市場偏好。

當日記出版之後，就從個人生命紀錄轉變爲公領域的敘事，日記的意義也有所改變。艾佩琪最初想要出版日記，可能與財務問題有關。二戰結束後，佩琪接受朋友馬若迪夫婦的邀請，定居加拿大維多利亞市；意外的是，突然收到失聯多年的好友艾尼可的來信，繼而譜出一段姻緣。由於艾尼可的流亡喬治亞王儲身分，佩琪開始以「王妃」之姿經營新生活，還開闢了占地 1 英畝的私人花園——「艾氏花園」（Abkhazi Garden）——以供賞玩。到了 1970 年代，他們逐漸無法負擔「貴族」的品味生活，必須開闢財源。後來在好友及索諾尼斯出版社（Sono Nis Press）老闆的鼓勵和支持下，79 歲的艾佩琪終於在離開收容所 36 年之後，出版她的戰時日記，書名定爲《奇特的牢籠：一部上海日記，1941-45》（*A Curious Cage: A Shanghai Journal, 1941-45*），由維多利亞大學歷史系教授傑克曼協助編輯並撰寫導論。這家出版社規模不大，

每年出版 5 至 8 本書，在網路時代之前，經銷通路限於加拿大，[104]這也影響到《奇特的牢籠》的流通情況：出版 6 年內僅售出 3,000 本。[105]此外，讀者對本書的評價普通，甚至有人批評佩琪只是個「享有特權」、「受到保護」、「簡單」、「天真」的英國女人，日記裡的敘述盡是無關痛癢的生活瑣事。事實上，本書所得的版稅收入並不多，想要以此解決財務困境無異於緣木求魚。儘管如此，艾佩琪每次收到版稅支票時，仍然開心地以香檳及魚子醬來慶祝[106]——這是她第一次以「作家」的新身分示人，還得到實質的報酬。

艾佩琪並不是公開其拘禁生活經驗的第一人；從 1940 到 1990 年代，太平洋戰爭的記憶書寫及出版可分爲三個階段：第一波出現於戰時，儘管在日軍監控下，不少被關押者仍試圖爲自己的拘禁經驗留下隻字片語，不過出於安全或其他因素，許多紀錄被銷毀或佚失。第二波是在戰爭甫結束時，通常以回憶錄或自傳的形式呈現，並由宣教機構或小型出版社發行，流通不廣。第三波是 1970 到 1990 年代，被關押者步入晚年，深感保存其歷史記憶的急迫性——特別相較於世所矚目的歐洲集中營，遠東戰區被關押者的故事卻長期受到忽略，使之自覺有必要向世人訴說這段歷史。同時，西方學術界開始注意「市井小民」的研究趨勢，也促使相關的回憶錄及口述歷史相繼出版。[107]艾佩琪在第一波所留下的日記，正是在第三波「戰爭記憶」的脈絡下公諸於世。

值得注意的是，艾佩琪藉由出版日記，不但冠上「作家」的新頭銜，也獲得自我展演的機會。學術界出版日記一般是爲了提供研究的基礎，因此除了必要的判讀之外，一般不經任何增刪或修訂，以保持史料的原貌。艾佩琪則不同，出版日記的目的是訴說自己的故事，因而帶著濃厚的展示意味。對照日記原稿與出版日記發現，有部份段落被刪去，有些段落順序被更動；她在日

---

[104] http://www.sononis.com/about-sono-nis-press (accessed February 5, 2014).

[105] Peggy Abkhazi's letter to Richard Teleky, dated September 11, 1986. Abkhazi Archives, RG No: AR325, Box2/5.

[106] Katherine Gordon, *A Curious Life*, p. 211.

[107] Felicia Yap, "Voices and Silences of Memory: Civilian Internees of the Japanese in British Asia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Journal of British Studies*, 50:4 (October 2011), pp. 923, 932-935.

記本的封面及封底抄錄許多詩句及禱詞，也未出現在出版日記中。被刪去的文字表現較多的恐懼與不安，例如在原稿中，1943 年 2 月 25 日她描寫朋友「出城」的景象：「他們和一群陌生人擠進計程車裡，手提行李裝著營區生活頭幾天所需要的東西——肩膀上掛著兩隻熱水瓶，挨著司機坐進奢華的空間裡……感謝上帝，還有些東西讓我們可以笑得出來」。3 月 11 日又送走另一批朋友時，她寫道：「這幾天就好像到了老年活得比朋友及同輩還長的感覺。唯一的安慰是還能夠聽得到這些消息」。[108]這兩天的日記並未出現在出版日記中。相較於前文所引述 3 月 4 日的「新生活宣言」，這些詼諧的描寫背後透露著無奈與不確定感，因爲她可能是下一個「拎著熱水瓶出城」的人。佩琪刪去這些「勉強的笑聲」，避免把自己描繪成「軟弱的受害者」，進而展現出塑造個人形象的主動性。

此外，日記的出版使她開始與有共同經驗的人彼此連結。自從她移居加拿大後，身邊和她一樣有收容所經驗的人只有辛南希（Nancy Simpson），而當她積極融入新的社群時，上海經驗似乎也沉入記憶深處。直到日記出版後，她才透過贈書與過去的友人重新聯絡，包括在拘禁期間幫助她甚多的中國友人葉端生。[109]

除了舊識之外，艾佩琪也藉由出版日記結交新知。《奇特的牢籠》出版半年後，她收到一封陌生的來信，寄信者史加莉（Galina Smirnoff）在二戰期間住在上海，因「白俄」的無國籍身分免於拘禁的命運，卻對同盟國人士的收容所生活感到好奇。特別意外的是，她在上海的老闆竟然與佩琪同被拘禁在龍華收容所。此外，史加莉對於書中所提到的地名、人名也倍感親切，勾起許多往事回憶，並提醒她所讀過關於老上海的書籍。[110]儘管佩琪與史加莉在同時期住在上海，戰後也都移居加拿大維多利亞市，兩人乃透過《奇特的牢籠》

108 Peggy Abkhazi’s Diary, manuscript, in Abkhazi Archives, RG No: AR325, Box1/5.

109 Peggy Abkhazi’s letter to Daphne Fredericks, dated November 21, 1984. Abkhazi Archives, RG No: AR325, Box 2/5.

110 Galina Smirnoff’s letter to Peggy Abkhazi, dated February 17, 1982. Abkhazi Archives, RG No: AR325, Box 2/5.

才聯繫在一起，而關係紐帶就在於「上海外國人」的身分。

1984 年 10 月艾佩琪收到費達芬（Daphne Fredericks）的來信，她曾在上海擔任女校教師，二戰期間和佩琪一樣被拘禁在龍華，戰爭結束後回到英國。她寫信的目的是希望佩琪能幫助她，把「眞正的」收容所故事公諸於世。原來在數月前，英國作家巴拉德（J. G. Ballard, 1930-2009）將幼年時在龍華收容所的經歷寫成自傳體小說《太陽帝國》（*Empire of the Sun*）出版，極受好評，得到包括布克獎（The Man Booker Prize）等數項文學獎提名，並榮獲詹姆士布萊克紀念獎（James Tait Black Memorial Prizes）小說獎。[111]由於巴拉德本人出生於上海，並宣稱該書乃基於他在收容所的親身經驗與觀察，[112]不少人視之爲眞實歷史。費達芬卻認爲《太陽帝國》只是一個十幾歲男孩對收容所生活的想像，和當年龍華的情況完全不同；相較之下《奇特的牢籠》就顯得眞實得多，因此積極洽商英國出版社代爲銷售，並請艾佩琪聯絡出版社，把書寄給英國書商，她個人甚至願意負擔多至 1,000 英鎊的運費。萬一英國書商不願經銷，她希望艾佩琪能寫信給《泰晤士報》（*The Times*）說明收容所實況——她甚至在信中羅列《太陽帝國》的錯誤，便於艾佩琪指證。[113]儘管艾佩琪也認爲《太陽帝國》只是兒童觀點的故事，描述模糊失眞、時代錯置的例子比比皆是，而主人翁更像是「金銀島」的冒險英雄，[114]但她並未公開苛責巴拉德，因爲她始終相信在龍華收容所裡，英國人的行爲足爲模範，是不折不扣的英雄。[115]

從這些通信可以看出，日記的出版不但向世人揭露一段被人遺忘的歷史，更使作者開始重新鏈接至「上海外國人」的文化認同：她主動贈書的對象，

---

111 http://www.ed.ac.uk/news/events/tait-black/winners/fiction (accessed February 7, 2014).

112 J. G. Ballard, *Empire of the Sun* (London: Victor Gollancz Ltd., 1984).

113 Daphne Fredericks' letter to Peggy Abkhazi, dated October 10, 1984. Abkhazi Archives, RG No: AR325, Box 2/5.

114 Peggy Abkhazi's letter to Daphne Fredericks, dated November 4, 1984. Abkhazi Archives, RG No: AR325, Box 2/5.

115 Katherine Gordon, *A Curious Life*, p. 210.

除了葉端生外，均是「前龍華人」（ex-Lunghua-ites）；費達芬找上艾佩琪，乃因她認為《奇特的牢籠》保存了「真正的龍華印象」。出版使艾佩琪的日記從記憶的承載者轉變為記憶的模塑者，與她有相同經驗的讀者不但證實她的敘述，更以此對抗他們所無法接受的「扭曲」故事。可以說，當日記從個人生命史變成大眾文化、並成為模塑一個時代共同記憶的基礎時，也開始建構一個以歷史記憶為核心的新社群。

費達芬的計畫並未成功，英國布萊克威爾出版社（Blackwell's）無意經銷或再版《奇特的牢籠》，但艾佩琪並不放棄，1986 年 8 月起，便積極聯絡牛津大學出版社，討論再版的可能性，不過直到她 1994 年過世前，都未能實現。儘管如此，為了證實日記的可信度以確立歷史的權威性，艾佩琪把日記原稿及相關文件捐給維多利亞大學，建立《艾氏檔案》。可惜的是，檔案中的日記手稿並不完整，只有 1943 年 2 月 25 日至 12 月 23 日，至於其他部份現藏於何處不得而知。事實上，整個《艾氏檔案》的藏品具有高度的選擇性，主要是收容所中的相關紀念物（如臂章、收容所通知等）、艾氏夫婦年輕時的照片、艾氏花園的照片以及他們皇室身分的證明文件。令人驚訝的是，艾佩琪是個勤於寫信的人，檔案中的書信卻不多，主要是和日記出版有關的信件往來。根據傳記作者高凱琳所言，艾佩琪把大部份的老照片送給乾女兒及朋友，園藝工具及書籍則留給園丁和管家，而最私密的信件與備忘錄，尤其是與先生的通信，則全部銷毀。[116]整體而言，從日記的出版至於大學檔案的建立，都是艾佩琪自我展演的形式。

《奇特的牢籠》的出版故事並未因著作者過世而劃下休止符；事實上就在艾佩琪過世的第二年，英國亞蘭蘇頓出版社（Alan Sutton Publishing, Ltd.）將這部日記改以《「敵國人」：日本收容所的生活，1943-1945》（*"Enemy Subject": Life in a Japanese Internment Camp, 1943-1945*）為題重新出版，還請巴拉德為之作序。巴拉德盛讚艾佩琪的描寫真實，甚至比舊地重遊更能喚起他對龍華

116 Katherine Gordon, *A Curious Life*, pp. 225-226.

收容所的記憶。不過巴拉德也提到，他們的觀點十分不同：當時他自己是個13、4 歲的男孩，而佩琪是個 40 幾歲沒有家累的單身女性，「這使她有自由可以與周遭的絕望生活保持距離，也讓她有心理空間去反省她在拘禁期間所學到關於人性的教訓，以及如何因應無聊、飢餓和所厭惡的強制性集體生活」。[117]可以看出，巴拉德肯定艾佩琪的日記之餘，仍不忘爲自己的故事辯護。至此，艾佩琪終於達成在英國出版日記的心願，不過反諷的是，她本來想利用自己的故事來平衡巴拉德的報導，最後卻由巴拉德爲她的故事背書。

2002 年，索諾尼斯出版社再版《奇特的牢籠》，這次出版主要和艾氏花園的產權爭議有關。艾佩琪沒有子嗣，以無息分期付款方式將花園賣給園丁；他們從 1979 年就開始照顧艾氏花園，後來買下花園以保障艾佩琪晚年生活無虞，並努力維持花園原貌，然而高額的維護費用及財產稅使他們不得不轉讓產權。[118]1999 年 8 月，開發商買下這片土地，打算建造房屋，卻遭到當地居民的反對——當地報刊把艾氏夫婦「橫跨三洲」的愛情故事描繪爲維多利亞市的浪漫傳奇，[119]艾氏花園則是「加拿大少數受到國際認可的一座私人花園」；若把花園改建爲住宅，無異將喪失「一顆維多利亞寶石」（a Victoria jewel）。[120]後來在維多利亞的「土地保護」（The Land Conservancy）及紐約的「花園保護」（Garden Conservancy）等民間環保團體的介入下，成功地募集資金及取得貸款，向開發商購回土地，才使這片「以愛建立的花園」得以保存。[121]這次土地爭議使艾佩琪成爲媒體焦點，她的故事也再度引起興趣，因此索諾尼斯出版社在她百歲冥誕時出版《奇特的人生：艾佩琪王妃的傳記》（*A Curious Life: The Biography of Princess Peggy Abkhazi*），並在她的花園舉辦新

---

117 J. G. Ballard, “Foreword,” in Peggy Abkhazi, *‘Enemy Subject’: Life in a Japanese Internment Camp 1943-1945*, edited by S. W. Jackman (Phoenix Mill: Alan Sutton Publishing Ltd., 1995), pp. 7-8.

118 Jody Paterson, “Back to the Garden of Love,” *Times Colonist* (Victoria, B. C.), January 30, 2000, A1.

119 Cindy E. Harnett, “Homes May Swallow World-Famous Garden,” *Times Colonist*, August 11, 1999, C1.

120 C. Duncan, “What’s the Rush ?” *Times Colonist*, August 23, 1999, A9.

121 Kim Lunman, “Fairy-tale Garden in Victoria May Be Saved: Builder Holds off Plans as Funds Are Raised” *The Globe and Mail* (Toronto), January 18, 2000, A7.

書朗讀，同時再版她的日記《奇特的牢籠》。[122]維多利亞向有「花園城市」（city of garden）之譽，艾氏花園事件成爲凝聚社區意識、維護社區認同的踏腳石；當艾佩琪被大眾媒體形塑爲維多利亞的傳奇，她的上海日記就變成這個故事的起點，構成維多利亞歷史遺產的一部份。

結　論

艾佩琪的日記雖然是一個平凡女子的戰時紀錄，其內容也不脫日常生活的瑣碎細節，但它對建構歷史敘事（historical narrative）仍有重要的貢獻。首先，它提供「敵國人集團生活所」的資訊，開啓戰爭史研究新的可能性。長期以來，戰爭史的研究焦點多半集中在與軍事行動直接相關的人、事、地、物，而且著重於英雄式的事蹟，不論是光榮的勝利或是壯烈的犧牲；俘虜代表雙重「失敗」：投降成爲俘虜既是戰場失敗的結果，也意味著未能「盡忠」，因此戰俘研究在戰爭史中被邊緣化是可想而知的。而戰爭中被拘禁的「敵國人」更難歸類：他們並未參與戰事，並不具備戰俘身分，卻又受日軍直接管轄（有些人被關押，僅僅因爲戰爭爆發時，他們正好在開往遠東的船上），不但戰時軍事救援計畫中屬於次要的優先順序，戰後賠償也微薄得毫無實質意義。[123]同時，戰爭結束後日軍迅速銷毀相關檔案，以致收容所內的故事長期以來鮮爲人知。艾佩琪的日記，正是這一段歷史的見證，使我們得以重新審視太平洋戰爭。

---

122 Joseph Blake, “100th Birthday for a Princess,” *Times Colonist*, December 5, 2002, D12.

123 1950 年代英國政府從凍結的日軍財產中撥款賠償，每人僅分得 48.5 鎊，且只有 21 歲以上、戰前常年居住在英國、戰後分配賠償時在英國的英籍成人才分得到，因此戰前定居上海、戰後移居加拿大的艾佩琪並無法取得賠償。美國也只提供每人 60 美元的賠償金。直到 1990 年代美國政府對二戰期間關押日裔美人道歉並賠償後，在遠東戰場被日軍關押的英國人也開始透過遊說團體提出賠償要求，後來英國政府給予每人 10,000 鎊的賠償，但日本政府堅持該項賠償已在 1952 年的舊金山和約中解決，遂不予賠償。Felicia Yap, “Voices and Silences of Memory: Civilian Internees of the Japanese in British Asia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Journal of British Studies*, 50:4, pp. 932-936.

其次，日記的寫作性質使我們有機會聽到宏觀論述之外的「雜訊」。日記和自傳（包括回憶錄）都是書寫自我的文體，不過性質有相當大的差異：如果說自傳是「現在的我」對「過去的我」的重構與詮釋，[124]那麼日記可以說是爲了擔心「將來的我」遺忘「現在的我」而預留的紀錄。[125]儘管兩者都是建構自我的行動，自傳通常有特定的意圖及明確的主題，是傳主自我評價的結果，因此與主題無關的「旁枝末節」往往被刪除；但日記乃記錄當下的觀察，一般而言沒有特定主題，即便像佩琪一樣，一開始設定書寫目的，時間久了，便不容易對準原有的焦點——不過正是如此，得以在日常生活瑣屑之中透露出某些問題的複雜性。例如，佩琪對收容所制度及日本憲兵隊極度反感，直到 1980 年代還曾寫信給日本大使要求道歉與賠償；[126]然而戰時日記裡對日本指揮官林知彥的記載卻揉合了感激、同情、憤怒等複雜情緒。這些敘述挑戰我們對於日本「軍國主義暴行」的刻板印象，提醒我們必須重新思考戰時「敵我對立」的關係。

儘管日記是「當時人記當時事」的第一手史料，它的主觀性比其他性質的資料來得高，因而影響研究者的觀察格局。這種主觀性來自個人特質，也來自結構因素：佩琪的養成過程缺乏同儕互動，再加上沒有任何家庭依附關係，日記中對人的描寫顯得較爲冷淡而有距離，所反映的是自我中心的世界觀，這和家庭主婦極爲不同：當佩琪抱怨集體生活的嘈雜與不便時，被關押在滬西大西路收容所的史偉莉（Gwyneth Still）卻爲了必須在眾目睽睽下訓練

124 羅久蓉，〈近代中國女性自傳書寫中的愛情、婚姻與政治〉，《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期 15（2007 年 12 月），頁 82-87。

125 Irina Paperno, "What Can Be Done with Diaries ?," *The Russian Review* 63:4 , pp. 564-565.

126 這件事起因於一名日裔加拿大人要求政府針對二戰期間關押 23,000 名日裔的舉動正式道歉並賠償，促使艾佩琪寫信向日本大使提出賠償要求，不過日本堅稱已在舊金山和約中解決，而不予賠償。Brenda Dalglish, "Apology, Compensation Asked by Japanese for Long Internment," *Times Colonist*, November 26, 1982. Peggy Abkhazi's letter to Japanese Ambassador, dated December 4, 1982. Japanese Ambassador's letter to Peggy Abkhazi, dated December 10, 1982. Peggy Abkhazi's letter to Japanese Ambassador, dated December 16, 1982. Abkhazi Archives, RG No: AR325, Box 2/5.

孩子而感到不自在。[127]巴拉德也說，他的父母對龍華的記憶總是比他來得嚴厲。[128]換句話說，日記裡所呈現的自我是社會、歷史、文化脈絡下的建構，而非永恆的眞實。[129]

最後，艾佩琪日記的書寫風格與呈現方式，也挑戰我們對日記這種材料的既定看法。以第一人稱爲敘述主體的日記通常被視爲一種私密文本，但佩琪一開始便有意識地選擇以書信形式寫日記，顯示她仍渴望被聽見；日記並非一個上了鎖的盒子，承載著不欲人知的隱私，而是與密友分享內心世界的管道，儘管她不確定對方是否有機會聽見。不過在這個階段，日記仍然屬於艾佩琪可以自行決定揭露或隱藏的私領域；當日記出版之後，就跨入公領域的範疇，把自己暴露在與個人生命無關的大眾眼前。她當然可以藉此自我展演，但也同時受到讀者的檢視。特別有趣的是，日記的出版過程逐漸逸出艾佩琪原有的生活軌跡，形成《奇特的牢籠》的外一章。從個人性書寫到公眾性展演，艾佩琪的日記故事幫助我們探索更多日記研究的可能性。

127 Audrey Salters ed., *Bound with Love: Letters Home from China 1935-1945* (St. Andrews: Agequod Publications, 2007), p. 302.

128 J. G. Ballard, "Foreword," in Peggy Abkhazi, *'Enemy Subject': Life in a Japanese Internment Camp 1943-1945,* p. 8.

129 Felicity A. Nussbaum, "Toward Conceptualizing Diary," in James Olney, ed., *Studies in Autobiography,* pp. 128-129.

附表　艾佩琪日記日期

年／月／日	頁碼
1941/12/8	23
1941/12/11	25
1941/12/12	25
1941/12/13	26
1941/12/15	26
1941/12/16	28
1941/12/23	29
1941/12/25	30
1941/12/29	30
1942/1/4	31
1942/1/8	32
1942/1/10	33
1942/1/15	33
1942/1/20	34
1942/2/3	35
1942/2/10	35
1942/2/17	35
1942/2/18	37
1942/2/19	37
1942/3	38
1942/5	41

年／月／日	頁碼
1943/3/4	51
1943/3/30	54
1943/4/7	54
1943/4/9	59
1943/4/17	61
1943/4/23	65
1943/4/25	68
1943/5/1	70
1943/5/7	72
1943/5/12	75
1943/5/18	79
1943/5/26	81
1943/5/30	82
1943/6/14	84
1943/6/26	86
1943/7/7	89
1943/7/10*	91
1943/7/10*	93
1943/7/20	97
1943/8/11	57
1943/8/12	98
1943/9/13	100
1943/9/17	101
1943/9/27	103
1943/11/23	105
1943/12/23	107
1943/12/24	109

年／月／日	頁碼
1944/1/3	110
1944/1/30	113
1944/4/5	115
1944/5/1	118
1944/6/9	120
1944/6/12	122
1944/8/18	123
1944/8/21	124
1944/8/24	128
1944/8/25	129
1944/11/8	130
1944/11/12	133
1945/3/21	134
1945/3	136
1945/4/1	137
1945/4/3	138
1945/5/7	138
1945/5/31	141
1945/6/17	142
1945/8/11	143
1945/8/12	144
1945/8/23	148
1945/8/28	150
1945/8/30	151
1945/9/12	152

資料來源：Peggy Abkhazi, *A Curious Cage: Life in a Japanese Internment Camp, 1943-1945* (Victoria, B. C.: Sono Nis Press, 2002)。

* 說　明：原文即有兩篇7月10日的日記。

徵引書目

一、史料

Abkhazi Archives, University of Victoria, B. C. Canada, RG No: AR325, Box1/5-2/5.

Peggy Abkhazi's Diary, manuscript.

Daphne Fredericks' letter to Peggy Abkhazi, dated October 10, 1984.

Galina Smirnoff's letter to Peggy Abkhazi, dated February 17, 1982.

Peggy Abkhazi's letter to Daphne Fredericks, dated November 4, 1984.

Peggy Abkhazi's letter to Daphne Fredericks, dated November 21, 1984.

Peggy Abkhazi's letter to Japanese Ambassador, dated December 4, 1982.

Peggy Abkhazi's letter to Japanese Ambassador, dated December 16, 1982.

Peggy Abkhazi's letter to Richard Teleky, dated September 11, 1986.

"Interview Records of R. Mabel Haynes," OH2317, in the Center of Oral and Public History, 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at Fullerton.

Ken Flemons, "Out of the Frying Pan," Private Papers of K. J. Flemons, Imperial War Museum (London), Documents 2230.

L. A. Collyer's Diary, copy of transcribed manuscript, in the special collection of the University of Honk Kong.

二、專著

陶菊隱，《孤島見聞——抗戰時期的上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

楊天石，《找尋眞實的蔣介石：蔣介石日記解讀》，香港：三聯書店，2008。

鄒依仁，《舊上海人口變遷的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熊月之，《異質文化交織下的上海都市生活》，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4。

Abkhazi, Peggy. *A Curious Cage: Life in a Japanese Internment Camp, 1943-1945*. Edi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S. W. Jackman. Victoria, B. C.: Sono Nis Press, 2002.

Archer, Bernice. *The Internment of Western Civilian under the Japanese 1941-1945: A Patchwork of Internment*.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4.

Ballard, J. G. *Empire of the Sun.* London: Victor Gollancz Ltd., 1984.

Everdell, William R. *The First Moderns: Profiles in the Origins of Twentieth-Century Thought*.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97.

Gordon, Katherine. *A Curious Life: The Biography of Princess Peggy Abkhazi.* Winlaw, British Columbia: Sono Nis Press, 2002.

Hampsten, Elizabeth. *Read This Only to Yourself: The Private Writings of Midwestern Women, 1880-1910.*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2.

Leck, Greg. *Captives of Empire: The Japanese Internment of Allied Civilians in China, 1941-1945.* Bangor, Philadelphia: Shandy Press, 2006.

Taylor, Jay. *The Generalissimo: Chiang Kai-shek and the Struggle for Modern Chin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三、論文及專文

王汎森，〈日譜與明末清初思想家——以顏李學派爲主的討論〉，《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69 本第 2 分，1998 年 6 月，頁 245-294。

呂芳上，〈提供史料不提供觀點的盛會〉，收入呂芳上主編，《蔣中正日記與民國史研究（上）》，臺北：世界大同出版有限公司，2011，頁 1-4。

許雪姬，〈序二〉，收入許雪姬主編，《日記與臺灣史研究：林獻堂先生逝世 50 週年紀念論文集（上）》，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08，頁 iii-vii。

張淑雅，〈蔣介石一瞥：1950 年代後期日記中的觀察〉，《臺灣史研究》，卷 18 期 1，2011 年 3 月，頁 185-216。

羅久蓉，〈近代中國女性自傳書寫中的愛情、婚姻與政治〉，《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期 15，2007 年 12 月，頁 82-87。

Bickers, Robert. “Shanghailanders: The Formation and Identity of the British Settler Community in Shanghai, 1843-1937.” *Past and Present*, No. 159 (May 1998), pp. 161-211.

Bickers, Robert. “Settlers and Diplomats: The End of British Hegemony in the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 1937-1945.” In Christian Henriot and Wen-hsin Yeh, eds., *In the Shadow of the Rising Sun: Shanghai under Japanese Occup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229-256.

Bunkers, Suzanne L. “Midwestern Diaries and Journals: What Women Were (Not) Saying in Late 1800s.” In James Olney, ed., *Studies in Autobiograph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 190-210.

Ginzburg, Carlo. “Microhistory: Two or Three Things That I Know about It.” *Critical Inquiry*, 20:1 (Autumn 1993), pp. 10-35.

Gregory, Brad S. “Is Small Beautiful? Microhistory and the History of Everyday Life.” *History and Theory*, 38:1 (February 1999), pp. 100-110.

Lepore, Jill. “Historians Who Love Too Much: Reflections on Microhistory and Biography.”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88:1 (June 2001), pp. 129-144.

Lüdtke, Alf. “Introduction: What is the History of Everyday Life and Who are its Practitioners?” In Alf Lüdtke, ed., *The History of Everyday Life: Reconstructing Historical Experiences and Ways of Life.* Translated by Willism Temper.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3-40.

McNeill, Laurie. "Performing Genre: Peggy Abkhazi's *A Curious Cage* and Diaries of War." *Canadian Literature*, 179 (Winter 2003), pp. 89-105.

McNeill, Laurie Ann. "Public Designs for a Private Genre: Community and Identity in the Diary."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2004.

Nussbaum, Felicity A. "Toward Conceptualizing Diary." In James Olney, ed., *Studies in Autobiography*. New York/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128-140.

Paperno, Irina. "What Can Be Done with Diaries?" *The Russian Review,* 63:4 (October 2004), pp. 565-573.

Putnam, Lara. "To Study the Fragments/Whole: Microhistory and the Atlantic World." *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 39:3 (Spring 2006), pp. 615-630.

Yap, Felicia. "Voices and Silences of Memory: Civilian Internees of the Japanese in British Asia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Journal of British Studies,* 50:4 (October 2011), pp. 917-940.

四、報紙

North China Herald (Shanghai), 1930, 1938.

The Globe and Mail (Toronto), 2000.

Times Colonist (Victoria, B. C.), 1982, 1999, 2000, 2002.

五、網路資源

中國人民大學家書文化研究中心，http://www.jiashu.org/bbs/index.asp?boardid=6。（2014 年 1 月 22 日檢索）

臺灣日記知識庫，http://taco.ith.sinica.edu.tw/tdk/%E9%A6%96%E9%A0%81。（2014 年 1 月 22 日檢索）

Imperial War Museum, http://www.iwm.org.uk/collections/search?query=internment+and+Shanghai%2C+diary&submit=&items_per_page=50 (accessed June 19, 2013).

Rankin, Murray. "Statement in the House-Second World War Bravery." http://murrayrankin.ndp.ca/statement-in-the-house-second-world-war-bravery (accessed February 2, 2014).

Sono Nis Press, http://www.sononis.com/about-sono-nis-press (accessed February 5, 2014).

The University of Edinburgh, http://www.ed.ac.uk/news/events/tait-black/winners/fiction (accessed February 7, 2014).

From Self-Writing to Public Performance: Peggy Abkhazi's Wartime Diary

Lien Ling-ling*

Abstract

This article analyzes Peggy Abkhazi's diary to examine how journal writing affected self-construction. Born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Shanghai, the British woman Peggy Abkhazi was interned in the Civil Assembly Center (CAC) in Shanghai during the Pacific War (1941-1945). During her internment, she recorded details of her daily life in the CAC until the end of the war. Rather than using the diary as a source to reconstruct the organization of the CAC,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action of keeping a journal: how journal-keeping became part of daily life during the war and what it meant to the diarist. Published three times since the 1980s, Peggy Abkhazi's diary served not only to unveil a wartime story but also to rebuild the collective memory of the so-called Shanghailanders as well as strengthen the local identity of new immigrants. Tracing the multi-layered history of diary writing and publishing, this article explores new ways of studying diaries.

Keywords: diary, the Pacific War, Alien Civilian Assembly Center, concentrate camp, Shanghailander

*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